

提高警惕
粉碎右派陰謀

1957年7月

說 明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我們目前学习的主要文件。現在为了适应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需要，我們又將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些重要社論編入本書第一部分，作为提高認識，粉碎右派謬論的学习文件。

在本書第二部分中，分別編选了北京和上海在大放大鳴期間暴露的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右派謬論，作为参考材料（各个單位还应当就地取材，补充以本單位所发表的右派言論作为参考材料）。我們可以毛主席指示的六項标准为武器，来分析批駁这些謬論，使这些謬論以及类似的一切謬論再不能迷惑、毒害人民。

关于直接批駁右派言論和揭发右派阴謀活动的材料，报上发表的很多，此地不能一一編集，仅选編了几篇，作为第三部分。因为这几篇材料可以帮助我們了解右派分子的来龙去脉，帮助我們了解右派分子是一个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的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阴謀集团。从所有这些文件中，会使我們了解今天所进行的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1957年7月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1. 人民日報社論

- 这是为什么？（6月8日） 1
- 要有积极的批評，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評（6月9日） ... 4
- 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6月11日） 8
- 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評（6月12日） 13
- 是不是立場問題？（6月14日） 17
- 不平常的春天（6月22日） 20
- 再論立場問題（6月29日） 26
- 文汇报的資產階級方向应当批判（7月1日） 31

2. 解放日報社論

- 論算旧賬（6月14日） 36
- 整风的两条路綫（6月15日） 40

第 二 部 分

- 章伯鈞“政治設計院” 45
- 罗隆基“平反委员会” 49
- 章乃器“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52
- 儲安平“党天下” 55
- 陈新桂的反动謬論（摘要） 58
- 葛佩琦的反动謬論（摘要） 59
- 王德周的反动謬論（摘要） 63
- 陈銘樞“只提缺点不提优点——大整大整风精神”（摘要） 64
- 黃紹竑 65

龙云的反苏謬論 (摘要)·····	66
陈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 工作會議上的書面发言·····	68
王造时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 工作會議上的发言·····	72
孙大雨如此談人民內部矛盾·····	77
楊兆龙希望檢查历次运动的合法性, 尤其是肃反运动·····	85
王恆守 我看高等教育工作 (摘要)·····	87
李康年 重申贖买二十年的主張(摘要)·····	90
徐仲年 烏“晝”啼·····	94
施蟄存 才与德·····	98
楚 歌 告全体同学書·····	101
沉痛者 請結束恐怖政策吧!·····	102
胡 放 閒話“民主”·····	103
不平者 中国人的呼声·····	104

第三部分

上海右派集团阴謀暴露·····	107
听听章伯鈞的狂言: “我說就是要和共产党爭天下”!·····	嚴信民 112
儲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	李 兵 117

補 遺

譚惕吾的反动謬論 (摘要)·····	123
楊玉清的反动謬論 (摘要)·····	125

这是为什么？

6月8日人民日报社論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盧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倀，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盧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象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

实现有职有权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見。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样不能不問：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見，为什么就是“为虎作倀”，“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則就“不会饒恕你”？

把盧郁文的发言說成“为虎作倀”，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們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來說，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資料，使人民摆脱了剝削階級的殘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現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沒有象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滿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錯誤，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錯誤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們，都在积极地提意見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領導。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維護社会主义民主、維護共产党的領導权的言論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倀”，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們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盧郁文“及早回头”，請想想他們所說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說他們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鋒队如此仇視的人們，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

么？

我們所以認為這封恐嚇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這封信的確是對於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這封信告訴我們：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綫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輩何香凝先生說得好：“今天是新時代了，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走上社會主義。難道在這個時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會有左、中、右了嗎？不會的。”她指出，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里嚮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里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着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退到革命勝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可是他們忘記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在全國一切進行整風運動的地方，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風運動使共產黨孤立，想使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孤立，結果真正孤立的卻是他們自己。在各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中，有少數右派分子象盧郁文所說，還想利用辱罵，威脅，“裝出‘公正’的態度來箝制”人們的言論，甚至採取寫恐嚇信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這一切豈不是做得太過分了嗎？物極必反，他們難道不懂得這個真理嗎？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要有积极的批评， 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

6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

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对于人民的事业是永远需要的。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就是一个有系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为了鼓励批评，为了打破批评者的顾虑，党在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只要是目的在于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无论怎样尖锐，都应该受到热烈的欢迎。对于这样的批评的任何压制，对于批评者的任何打击报复，都是完全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两句中国的古话，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牢记勿忘。

完全善意的批评，也可以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作适当的解释，也就是适当的反批评。很明显，正确的反批评并不妨碍批评的开展。它同对于批评的压制，同对于批评者的打击报复，毫无共同之处。允

許正确的反批評是完全正常的，禁止正确的反批評才是不正常的。

至于并非善意的批評，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專政、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結的批評，这就并不合于人民的利益，并不合于党的整风运动的利益。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評进行正确的反批評，自然更为必要了。

有人借用对于学术文化政策上的現成的術語，把各色各样的批評的开展也叫做“百家爭鳴，百花齐放”，或者簡称为“大鳴大放”之类。这种借用，并无不可。但是既然叫做“爭鳴”，叫做“齐放”，顧名思义，当然應該既容許发表这一种意見，也容許发表那一种意見，既容許批評，也容許反批評。否則，还有什么“爭鳴”“齐放”之可言呢？

但是，在目前的整风运动中，恰恰出現了这样一种不好的、甚至是极端恶劣的迹象，就是有人在竭力企图制止別人发表和自己不同的意見。盧郁文接到恐吓信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今天本报所載上海复旦大学舒宗侨等人阻撓竺移今发言的事件，也是一个例子。

現在确实有一些口口声声稱贊“齐放”“爭鳴”的人，实际上企图只讓他們自己講話，而不讓別人答辯。他們可以把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概封之为“教条”，把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一概貶之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照他們說来，发表这种意見就算做“鳴”“放”。可是，如果有人出来指出他們这种說法实际上是否定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他們就立刻說：“你为什么出来解釋，难道这不是妨碍群众‘鳴’‘放’的积极性么？”“我們是在帮助党整风呀，一切批評，即使不正确，难道不都是对党有益的么？”

他們說：“你說我弄錯了事實嗎？為什麼你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呢？”除了這些質問之外，也還有人（例如陳銘樞）從正面勸勉道：“光說缺點，不說優點，這才合乎‘整風精神’呀！”言下之意，那種既說缺點又說優點、既說錯誤又說成績的人，還有那些出來解答和辯論的人，就都是“整風”的擋路者了。於是，他們就把對方的嘴一下封住，至少也是把對方放到一個如果答辯就是“不虛心”的地位上去了。

大家想想，難道這就叫做“幫助黨整風”么？一個醫生任意地誇大和錯誤地判斷人們的病情，宣布某某人已經垂危，某某人已經不治；如果某人說，我雖有些小病，基本上還是健康的，你所說的病情並不符合事實，醫生就說，這就證明你不願意治病，打擊醫生積極性，這就證明你已經無可救藥。天下難道可以有這樣不講道理的醫生么？

從整風運動開始以來，已經提出來的對於黨和政府的批評和建議，很大部分是正確的，是必須加以傾聽、研究和採納的。可是，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錯誤言論也出現了不少。例如，現在就有人在宣傳應該取消共產黨的領導，有人在咒罵社會主義建設全部搞錯了，有人在宣揚再延長資本主義剝削到二十年之久的“正義性”，等等。既然有這兩種不同的批評，那麼，每一個對人民事業負責的人，就不能胡里胡塗、不加區別地把一切批評都說成是對人民有益的，就不能不對那些錯誤的、破壞性的“批評”提出反駁的意見。對於錯誤意見沒有反批評，不進行辯論，不僅不能把道理弄清，而且必然使社會主義事業受到損害。鄧初民先生說，“大鳴大放之後，必須大爭”，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才基本完成，階級鬥爭並未結束，資產階級思想還

在各方面和无产階級思想爭奪陣地和領導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辯論當中，就不能不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揭示出各種批評的實質，否則我們就不能正確地認識它們和正確地對待它們。

有一種不贊成反批評的人，他們把可能會出現的反批評預先起個名字叫做“收”。例如上海文匯報上就已經有人說：“最近有點‘收’的跡象”。這樣說的人，許多人是出於誤解，但是也有人另有用意。如果有人把合於自己心意的批評叫做“放”，把不符合他們心意的反批評就叫做“收”，把說反面話叫做“放”，把說正面話就叫做“收”，甚至還要對說正面話的人橫加謾罵和恐嚇，那麼人們不能不問：人民的言論自由，首先是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的言論自由，究竟是在哪裡呢？如果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的言論自由不許“放”，那麼，那些所謂擁護“放”的人，對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的言論自由，不是在實行“收”麼？我們認為，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言論都必須大放而特放，只能放，不能收！

真理是不怕駁的，怕駁的就不是真理。害怕批評是怯懦，害怕反批評也是怯懦。不許批評是專橫；不許反批評，又何嘗不是專橫？要去掉專橫，批評和反批評就不能偏廢。為了克服社會主義事業中的缺點，克服黨的工作中的缺點，我們必須繼續廣開言路，堅決地開展積極的建設性的批評，繼續堅決地掃除對於有益的批評的任何障礙。同時，為了維護社會主義事業，反對那些破壞社會主義的“批評”，必須堅決地開展正確的反批評。只有這樣，黨的整風運動才能得到健康的發展。

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 基础上团结起来

6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是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锻炼而形成起来的。

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使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了起来。这个团结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种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因为最坚定地最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面，所以成为团结的核心和领导力量。依靠这种团结的力量，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为什么中国人民的大团结仍旧能够继续存在呢？为什么参加民主革命的各个阶级阶层没有因为彼此的利害矛盾而分崩离析呢？这是因为中国人民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共同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虽然已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中国仍旧是一个贫穷的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的国家。不改变这种落后的状态，就免不了挨打，就免不了重新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中国人在帝国主义支配下过活的情况，每个爱国人士一回到就感到痛苦和屈辱。要使中国人永远不至于再回到那种生活去，就必须使中国成为富强的工业化的国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有走社会主义这一条路。

除了社会主义，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好走么？难道可以

走資本主義的路么？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走資本主義的路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在帝國主義世界裡做個殖民地，至多是做半殖民地式的小伙計，就是把大門向帝國主義國家打開，就是讓帝國主義和它的向來使用慣了的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走狗在中國重新建立起統治。所以中國在民主革命以後事實上只能在這二者中選擇其一：或者向前走向社會主義，或者向后倒退到那種悲慘的痛苦的老中國去。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社會主義首先是工人階級的事業，是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的事業，但是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還能夠取得——而且也確實取得了——在工人農民以外的愛國人民的擁護。民族資產階級，雖然由於其階級本性，不能不對於徹底消滅一切剝削制度這件事感到抵觸，但是依靠中國工人階級的一系列努力，他們的大多數經過了一些懷疑、觀望、徘徊、動搖以後，看到了社會主義是中國民族的唯一出路，因而表示願意接受社會主義。對於許多受過資產階級教育、從各方面深刻感染到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接受社會主義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隨着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各種只適合於私有制度的老的想法和老的生活方式必須改變，而對於新的東西，許多人並不是一下子就能習慣的。但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並沒有因為這種情形而退却。他們越來越看到社會主義事業的進步性和正義性，他們也就越來越認識到，應當改造自己來適應於社會的進步，而不應當設想使社會制度適應於自己。

要走社會主義的路，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事業

中实行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方针。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依靠这种力量，我国现在已经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取得胜利，而且已经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第一步的巨大成就。

现在，社会主义不但已经成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不可抗拒的信念，而且已经成为实际生活的不可动摇的发展轨道。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我们祖国的独立、富强，就没有我国人民的自由、幸福，就不能保证六亿人口的衣食住行，这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说来，已经是非常明白的道理。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引诱中国人民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期间，在社会各界人士帮助党的整风运动的情形。企图利用整风运动来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些右派分子以为，他们的言论一定能够在工商业者中间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事实正象在北京举行的工商界座谈会中的情形所证明的，绝大多数工商业者终究并没有为右派分子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他们拒绝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右派分子又曾经以为可以利用青年学生的缺少社会经验而在学生群众中找到同盟军。但是事实也已经证明，当右派言论在学生群众中暴露出反对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的时候，就遭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唾弃。右派分子企图经过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打开中国人民大团结的缺口，这种企图已经遭遇到可耻的失败，当然更不用说要在工人农民中进行什么活动的妄想了。他们的这种妄想只会得到双倍的打击。

我国目前还有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这些

右派分子还在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活动，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有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一去不可复返，但是总有一些人还不死心，还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真能取得胜利，还想寻找机会来改变历史的进程。

过去的革命经验证明，每当历史的车轮急剧地前进的时候，总会有些人从车厢中抛出来。他们不能适应客观的变化。可是在他们被抛出以前，他们往往并不认为自己要被抛出，反而以为车子快要出轨了，快要倒霉了，而他们却将夤缘时会，成为真正识时务的角色。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巨大变革，在这种大变革中更不会不发生这种情形。社会处在大变革大改组的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某些暂时性的不完善不协调，从右派分子的眼中看起来，就是表明社会主义的命运已经不妙了，人民已经离开共产党了，人民已经讨厌社会主义了。他们以为，他们一跳出这个社会主义的列车，就会有千千万万人跟着他们一起走。

这些右派分子的算盘打错了。受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一天天取得更大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全国人民大团结也一定会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中国共产党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方针，进行党的整风，要求社会各界人士帮助党整风，克服党的工作中的各种缺点，这都是为了巩固人民的团结。而党认真这样作的结果，全国广大人民的团结也必然更加巩固。

为了真正巩固人民内部的团结，必须同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必须同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的

右派划清界限。我們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人民民主專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有一部分人对于新的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暂时还觉得不习惯，因而暂时有些怀疑、动摇和保留，这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們終將逐渐适应新的生活，并且积极参加新生活的建設。因此，他們的某些暂时的怀疑、动摇和保留，同右派分子的仇視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不同，必須严格区别的。人們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的某些現象提出善意的批評，对于共产党员的工作中的缺点錯誤提出善意的批評，无论这些批評怎样尖銳，对于党和人民政府都是极其有益的。我們必須接受一切正确的批評，糾正錯誤，改进工作。即使这种批評有时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完全不同，必須严格区别的。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民主專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們的国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問題。中国人民的大团結就是建立在对这样的問題的共同認識上面。右派分子企图混淆人們在这种根本問題上的認識。一切真正爱国的、愿意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的人就应当同右派划清界限，使对于是非問題的根本認識更加明确起来。只有这样，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团結才能够更加巩固。

有些右派分子本来自命为了不起的英雄，以为他們的一言一动能影响天下的安危。但是他們終于不能不发现，如果他們不根本改变他們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他們就將完全孤立，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憐虫。換句話說，他們就將被拋出时代的列車以外。同他們的命运相反，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團結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列車，必將在共產黨的火車頭的引導下，日夜不停地轟隆轟隆地前進，向着無限光明的未來前進。

正確地對待善意的批評

6月12日人民日報社論

我們的黨從來都教育黨員經常重視群眾的批評。最近期間，我們的黨為了開展整風運動，特別向黨外人士廣泛地徵求批評。從中央到各省市，各機關、各高級學校的黨組織都召開了座談會，或者採取其他各種措施，听取黨外人士和廣大的工作人員的批評和建議。黨外人士對黨的批評，一般工作人員對領導人員的批評，正在全國範圍內活躍地展開。

我們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以外，我們的黨沒有、也不應當有任何私利。我們身上的任何缺點和錯誤都會造成對人民不利的結果，我們必須堅決地加以消除。我們知道，廣大人民對我們的黨的信任所以毫不动摇。就因為我們能夠不斷地消除自己身上的缺點和錯誤而前進。黨外各方面對我們黨的工作的意見，是我們所不可缺少的鏡子，從这里面常常可以反映出有些我們自己一時還看不到的東西，使我們的工作更容易改進。我們愈是虛心听取黨外群眾的意見，並且努力改正自己的錯誤，黨和群眾的團結就能夠愈加鞏固。正因為這樣，我們的黨在開展整風運動的時候，決定放手地發動群眾對黨進行批評。

事實證明了，黨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絕大多數群眾對黨是信任和熱愛的，他們對黨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和積極

的建議。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各方面对党組織和党员的批評，絕大部分是好的、正确的、对党有益的。的确，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也出現了一些仇視社会主义、仇視共产党的恶意的破坏性的言論。少数右派分子企图把群众的批評引入歧途，利用批評运动达到削弱社会主义事业、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削弱党的領導的目的。因此，我們必須对右派的言論給以坚决的回击，使群众的批評得以健全的发展。但是，毫無疑問，我們絕不能够因为出現了右派的錯誤言論，因为对于这些錯誤言論进行了反批評，就放松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評的鼓励和支持。我們决不能够混淆广大群众的善意的批評同少数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批評之間的根本界限，尤其不能够容許某些觉悟不高、作风不好的党员借口对右派分子的回击，就不理睬群众的批評，甚至对批評者施行打击和报复。相反，我們必須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驟，繼續鼓励和支持广大群众的批評，繼續認真地解除他們的一切可能的誤解和顧慮，并且坚决依靠广大群众的监督和帮助，改正錯誤，改进工作。在这个問題上，我們决不能有任何的动搖。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使是非混淆，就会使整风运动半途而廢，那就恰好达到了右派分子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所謂善意的批評，是否必須是完全正确的呢？当然不是如此。批評者即使由于情况了解得不完全，不确切，因而提出的意見不完全正确，但是只要他是本着改进工作的积极目的而提出意見，这至少对于消除相互間的隔閡是有好处的。我們必須把这种批評同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批評严格地加以区别。这种批評虽然是不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們仍然必須首先注意它們的合理的方面和正确的部分，不要因为它們

有些錯誤，就一概加以抹煞。但是，这种批評既然有不正确的方面，也应当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法向批評者进行必要的解釋或批評，使批評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和全貌。

群众的批評采取了尖銳的形式，这好不好呢？这没有什么不好。我們应当善于冷靜地分析这种尖銳的批評，不要因为尖銳就受不住，就暴跳如雷。問題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尖銳的批評可以是完全正确的，温和的批評也可以是完全錯誤的。当然，有些批評者片面地追求尖銳，不免使批評帶了片面性，但是只要这种批評在根本上仍旧是善意的批評，那么我們就仍然应该肯定它們的正确的成分，心平气和地同批評者进行討論，也一定能够达到相互的理解，并且逐步地帮助批評者克服片面性。

如上所說，由于善意的批評有时也是不正确的，而且这种批評者由于立場不坚定，認識不全面，甚至会在短促的时间內附和右派的言論，所以人們有时不容易一下子就区别出善意的批評和右派分子的惡意批評。因此，为了区别这两种批評，我們必須采取謹慎态度，进行全面分析。我們不但要自己学会作好这种区别，而且要帮助一切善意的批評者也都学会同右派划清界限。

我們已經說过，在广大群众的批評中，絕大多数都是正确的，至少是部分地正确的。这些批評帮助我們揭露了我們的工作中的許多缺点和錯誤。凡是正确的批評，我們都应该勇敢地接受。誰要是为了面子、架子而不接受正确的批評，誰就不能作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們应该毫不躊躇地承認那些被群众正确地指出来的缺点和錯誤，并且迅速采取实际办法来实现他們所提出的一切合理的要求和建議。凡是能

够馬上改正的錯誤要馬上改正，能够馬上解决的問題要馬上解决。各級党組織根据中央整风指示中所提出的边整边改的原則，已經接受党外的批評而开始解决了一些問題。但是总的說来，在这一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在我們已經开始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論进行回击以后，我們应当很快地騰出手来，認真地解决一切需要馬上解决、也可以馬上解决的問題。当然，也有一部分批評和建議是否正确，一下子不容易弄清楚，或者問題比較复杂，牽涉的方面比較广，不應該輕率地作出决定。这些是完全可以同群众講清楚，并且得到群众的了解的。但是很多批評和建議的正确性是很明显的，接受这些批評，实现这些建議，并没有什么困难。对于这样的問題，我們一定要馬上行动起来，加以解决，至少开始动手去解决，而不要拖延搪塞，讓缺点和錯誤繼續存在和发展下去，讓群众帮助党整风的宝贵的热情受到挫折。

少数右派分子尽管想用他們的破坏性的言論来扰乱我們的整风运动，但是我們的整风运动一定要繼續进行到底，吸收党外群众帮助我們整风这件事也一定要繼續进行到底。我們愈能够坚决地接受一切善意的、正确的批評，愈能够迅速地改正錯誤，改进工作，党和广大群众的团結也就愈能够巩固，而右派分子也就愈陷于孤立。反对和孤立少数右派分子，同时同一切向我們的党善意地提出批評的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紧密地团結在一起，手携手地为改进党的工作、加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这是保証我們的整风运动健康地发展的必要条件。

是不是立場問題？

6月14日人民日報社論

在当前的整風运动中，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現象，就是对于同样一件事，人們的看法往往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們認為，这可以有好些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由于人們的立場不同。

有的人說，现在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什么又提出立場問題来呢？

我們認為，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排除立場問題。在我国目前时期，人民内部还是有不同的階級。資產階級的成員虽然正在向劳动者轉化，小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虽然已經参加了合作組織，但是这两个階級的思想影响都还將在長时期內存在。提出立場問題，了解各自的思想實質，正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則，連彼此的立場都还没有弄清，怎么能求得真正的团結呢？

我們的国家正在建設社会主义。在建設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原来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成員，都將最后轉化为工人和集体农民（包括他們的知識分子）。这是唯一的前进的方向。只有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才能在思想上达到一致。当然，要原来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成員完全轉入社会主义的立場是需要時間的，但是离开这个立場，却无法求得思想的一致，也就无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新立場和旧立場之間的矛盾。

在“團結——批評——團結”这个公式中，團結要有一个标准，批評也要有一个标准。根本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不从社会主义的立場进行批評，也就不会达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團結。

有人說，知識分子在过去几年中已經有了巨大的进步，而許多人却对于这个事实估計不足。我們認為，这个情况确是有的，在这个方面許多共產黨員犯了錯誤，必須加以糾正。但是同时也有許多知識分子对于自己的进步估計过高。如果不然，就无法解釋目前整風运动中的許多思想混乱了。

举一个例。在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成績究竟是不是主要的？这本来是不應該成为問題的，因为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是經過全国亿万人民奋斗和劳动得来的結果，是不依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发展的社会主义經濟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尽管有种种局部性质的缺点和錯誤，但是它們已經使祖国获得了迅速的进步，根本上改变了祖国的面貌。然而正是这个事实，在目前的許多知識分子中居然成为問題。在政治界、新聞界、教育界、文学艺术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的人士中，在青年学生中，都有一部分人（其中也包括极少数共青团員和共產黨員）对于这一点发生了怀疑。在有些地方，在某些人的煽动下，竟至造成一种空气，不許別人說成績是主要的，誰說了誰就是犯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大罪。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現象呢？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立場問題呢？

我們認為，成績究竟是不是主要的，這是值得展開討論的一個根本問題。我們建議全國各界都來辯論一下這個根本問題。因為承認缺點和錯誤的存在，現在並不成為問題。整風運動的任務，正是要動員全黨以至全國人民的力量，同這些缺點和錯誤作鬥爭。倒是否認成績，現在成了一個根本問題。因為如果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基本上是錯誤的，失敗的，人們的面前就會是一片黑暗，新中國就會是一片黑暗，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就會是一片黑暗。如果是這樣，那麼問題就根本不是整風，而是要毀滅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毀滅人民的信心和民族的信心。

這是我們的危言聳聽嗎？大家請看，凡在不許人們說“成績是主要的”這樣一陣歪風的影響所及的範圍內，難道不是已經造成了這樣一種混亂嗎？

造成一時的混亂，並沒有什麼可怕。因為客觀存在的事實，畢竟不是任何詭辯所能駁倒的。那些本來是堅決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現在由於故意製造這種混亂而在群眾面前顯出了自己的本來面目，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好。那些一時陷入混亂的人們，經過了一番思想上的鬥爭而終於回到真理這一方面來，這也沒有什麼不好。但是無論如何，對於這些人們說來，這樣一陣思想混亂，卻很難不說是一次深刻的教訓。

明察秋毫之末的大知識分子，不但不見輿薪，而且看不見天翻地復的歷史變化，却要等待普通的工人農民來糾正他。這樣的人，立場如果不是根本錯誤，至少也是沒有站穩吧？

一次教訓並不能最終地解決立場問題。人們為了最終地

完成立場的轉變，還會需要好多次教訓，特別是如果他們老是以為問題早已解決了的話。但是一次教訓到底是一次教訓。這也就說明了，目前的這一場爭論，儘管有些人暫時覺得渾身不舒服，却是多么必不可少。

不平常的春天

6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對於我國的政治界和知識界說來，是一段不平常的時間。

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這篇講演雖然到現在才發表，但是它的內容早已在社會各界人士中間傳佈了。這篇講演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闡明了我國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以後所面臨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它對於提高我國人民的覺悟，鞏固我國人民的團結，推進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無疑將產生深刻的久遠的影響。我們且不說遙遠的將來，只從二月底到六月中這短短一段時間來觀察一下，就已經可以看出它所提出的方針的威力來了。

由於系統地提出了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由於透徹地說明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由於在這個基礎上開始了黨的整風運動，我國的政治生活在過去一個時期內進行得特別活潑起來了。在一方面，人民群眾對於黨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積極的批評和建議，促使黨和政府積極地採取步驟改進自己的工作，加強自己同人民群眾的聯繫。在另一方面，某些對社會主義事業心懷不滿的資產階級右派

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丰富。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畅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们的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清醒地识别他们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纠正他们，批驳他们呢？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见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他们懂得这个方针将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证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证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講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

領導。因此，他們要求共同領導，或者要求共產黨在某些範圍內退出領導。他們竭力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解釋得適合於他們的目的，並且積極地在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工商業者 and 青年學生中收集他們的支持者。五月間，共產黨開始整風，而且要求黨外人士幫助黨的整風。他們認為機會來了。他們在幫助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不但誇大黨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造成一種只許講缺點錯誤、不許講優點成績的空氣，而且把官僚主義說成是社會主義的產物和代名詞，把宗派主義說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物和代名詞，把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和代名詞，向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展開了猖狂的進攻。黨根據群眾的革命覺悟應該在鬥爭的風雨里培養而不應該在溫室里培養的原則（這個原則在毛主席的講演中反復宣布過），決定暫時不給予回擊，讓群眾充分認識他們的面目，以便增長見識，得到教訓。這樣，他們的頭腦更熱了。在他們看來，簡直到處都在反對黨！簡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簡直非請他們出來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殘局不可！

結果如何呢？

同害怕者的預料相反，也同高興者的預料相反，天下並沒有大亂。向社會主義進攻的人們發現，被群眾包圍的並不是共產黨，而是他們自己。在這裡，事情本來是非常清楚，毫無奧妙的，因為在全中國，擁護社會主義的本來是絕大多數，社會主義運動本來是絕大多數人的運動，向絕大多數人挑戰怎麼能不身陷重圍呢？資產階級右派先生們，你們把中國人民幾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兒戲，把中國人民八年的建設史看作兒戲，把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和黨在群眾中的

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計力量对比的时候，連人口中占1%的人和占99%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們这样怎么能不犯錯誤呢？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犯了錯誤，是不是由于沒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我們且不說人民为了選擇社会主义道路，選擇共产党的領導，曾經經歷过多么严重的斗争；且不說宪法怎样确定了我們国家的性質；且不說匈牙利事件的結局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从匈牙利事件得出了怎样的教訓（“再論无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一文对于这一点已經說得够詳細了）。就在毛主席的講演里，也明明說着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資產階級不接受工人階級的政策，两者之間的矛盾仍然会变成敌我之間的矛盾；也明明說着我們必須拒絕資產階級民主制和无政府主义，必須堅持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堅持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明明說着否認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績是完全錯誤的，否認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完全錯誤的；也明明說着資產階級分子还有两面性，还需要繼續改造；也明明說着知識分子 还需要繼續改造，还需要加强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也明明說着对于錯誤的意見必須批判，而馬克思主义也必須在同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中間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十分明白确定的嗎？难道有什么人說过，社会主义的原則和无产階級專政的原則可以推翻，錯誤的意見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見可以不加批判嗎？但是右派分子对于不合他們心意的話，竟一概充耳不聞。对于他們說来，“大鳴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項庄舞劍，意在沛公。右派“鳴

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问，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还有人說，本来講的大規模的階級斗争已經基本上結束，怎么現在又講起階級斗争来了？大規模的階級斗争基本上結束了，这是事实。但是在政治战綫上，在思想战綫上，階級斗争还将繼續存在一个相当長的时期，这也是事实。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动起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肯止呢？讓我們回顧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进行的。为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經過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前者重在划分敌我，后者重在反对贪污、盜窃，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認真地彻底地展开过辯論。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們是并不同意的。他們既然不同意，他們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現在已經有了許多事实証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們不但是不贊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贊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

此，無論如何，一場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本來有爭論，而且是根本性質的、不容含混的爭論，掩掩藏藏暗地進行好呢，攤開在桌面上好呢？顯然，前者不好，後者好。表面上躲開這場爭論，決不會幫助我們平穩地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相反，經過這場爭論，弄清了人們的真面目，就將教育廣大群眾。這樣，就將使政治界、知識界以及社會各界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內部的團結將比以前更為加強，而社會主義制度也將比以前更為鞏固。

歷史是在鬥爭中前進的，人們的思想是在爭論中前進的。整風是不可避免的爭論，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爭論。現在有爭論，將來還會有爭論。毛主席的報告是提倡團結的報告。他所提倡的團結不是貌合神離、同床異夢的假團結，而是經過爭論達到的真團結。因此，毛主席的報告也是提倡爭論的報告。所謂百家爭鳴，正是要爭。在目前的爭論中，有些人難免又會想到天氣的寒暖。雖然立場之說還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場不同，政治氣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這卻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在我們社會主義者看來，目前的天氣確實是一個大好春光的艷陽天。是的，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為廣大的工人階級、勞動人民、革命知識分子和一切真正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覺悟，廣大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覺悟，都將在爭論中迅速地成長着，成熟着，用一種不平常的速度。

再論立場問題

6月29日人民日報社論

分清哪邊是左，哪邊是右這件事，在當前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風浪中，曾經一度成為嚴重的問題。

事物在時間和空間里面運動着。按照事物的发展規律，從已經成熟的條件出發，積極推動事物前進的，就是左；違反事物的发展規律，拖着事物不讓前進或者向後倒退的，就是右。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凡是積極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積極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積極加強國際社會主義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團結的言論行動，就是左；積極反對這些的言論行動，就是右。這些道理看來是人人能夠了解、不至於發生爭論的。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明明是左的言論行動，有時也會被某些人說成右；明明是右的言論行動，有時也會被某些人說成左。

拿眼前的事實說吧。在不久以前一個時期的報紙上，曾經發表過一批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反對社會主義、反對人民民主專政的言論。這些言論引起了廣大群眾首先是工人群眾的極大的憤慨。北京市印刷工人朱寶琛，在6月2日看到報上刊登的儲安平的發言之後，雖然當天他在夜班工作到第二天上午兩點鐘，卻憤激得不能睡覺，連夜給本報寫了一封一千七百多字的信。一直到早上九點寫好投郵才休息。北京廣播器材廠職工看了報紙上登載了許多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而沒

有登載駁斥的文章，公推了林路滋、李尙武兩人作代表，在6月4日上午到本報責問編輯部，是不是報紙變質了，不是人民的報紙了？隨後，他們又開了一百六十九人的座談會，聯名寫信給本報抗議儲安平、葛佩琦的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並且再三催促本報早日發表。北京國棉二廠老工人秦淑英，在該廠工會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的時候，追述到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全家生活的痛苦和她本人當時所受的打罵侮辱，同今天的日子完全不能比較，想不到還有人說現在不如過去，竟氣得昏了過去。象這樣的事例很多很多。參加讀報組的農民聽到報紙上發表的反動言論，也紛紛來信提出抗議。隨後，青年學生和其他階層的人民也踊躍地參加了這個鬥爭的行列。

廣大群眾對於右派分子的态度是堅決的，立場是明確的。他們看了本報在本月8日以來的一系列反擊右派分子的社論，覺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興，因為這些社論支持了革命的的正氣，打擊了反社會主義的邪氣。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論調却完全不同。他們看到報紙上的讀者來信、工人座談和反擊右派分子的社論，馬上大驚小怪起來，說什麼報紙的态度變了呀，恐嚇信值不得小題大作呀，恐嚇信和讀者來信還不知是真是假呀，葛佩琦只是态度偏激、儲安平無非想出語驚人呀，就是反社會主義也不該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這類論調中，顧執中先生的兩句話特別有意思：“群眾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這兩句話所以特別有意思，因為其中所說的“群眾”，所說的“左”和“右”，意義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這裡，真可以說是沒有共同的語言了。

在顧執中之流看来，什么是“群众”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众的右派分子，还有就是一时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分子走的少数人；至于起来批评右派分子的人民群众，那是被取消了称为“群众”的资格的。至于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呢？在顧執中之流看来，儲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論就是“左”，而批駁这些言論，就是“右”，或者叫做“气量不大”。顧執中接着說的一段話可以作为注脚：有些人“虽然知道大‘鳴’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軌道，但在講話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越出了社会主义軌道又是意味着走上了什么主义的軌道呢？他可沒有說。大概总不是越过了当前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跑到遙远将来的共产主义阶段去了吧。那么，顧執中所說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难道不是指着反社会主义的感情么？然而他說这就是“左”！

的确，已經被揭发出来的那些右派分子，有许多人是很謙虛地給自己戴上了一頂“左”的帽子的。章伯鈞不是借着据說是別人的話，来称赞他自己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順”，而且一向以“左派”自居么？罗隆基不是口口声声說他是爱护党，他主張共产党不要在知識分子中发展党员，只是为了“不愿意使党的威信有絲毫的損失”么？章乃器不是处处使用着社会主义的和馬克思主义的詞句，使用着拥护中共中央的詞句，以显示他的“左”么？龙云不是宣称他的反苏謬論是“爱国”的么？热心于为反革命分子喊冤的黄紹竑，不是說他自己是共产党“耿耿忠心”的么？至于顧執中本人，虽然要求資产阶级式的新聞自由，对于人民政府沒有支持他办一个私营通訊社来同新华社竞争这件事表示不滿，按

照他所提出的标准，当然更是“左了”的“群众”的一分子了。

中国人民的确是需要左的，而且他們的确是在繼續向左的方向走，但是他們的确不需要顧执中們所說的那種左：即离开社会主义的軌道而向后倒退的所謂左，而是需要沿着社会主义軌道繼續前进的那種左，需要不讓右派分子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那種左。可是这种左却被顧执中們說成是右。說到这里，我們真要謝天謝地，庆幸人民政府沒有支持顧执中办起他的那样一个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指右为左、指左为右的通訊社来。

大家看吧！在右派分子同我們之間，左右的方向竟可以这样完全不同。这种情况似乎玄妙，但是仔細想一想，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这是真話。原来我們和右派分子是站在完全不同的方向和立場上看問題的。我們是身子朝前走、眼睛朝前看的，所以我們把前进叫做左，把后退叫做右。可是右派分子却是一种很特別的人，他們好比傳說中的申公豹，眼睛、鼻子、嘴都是朝后長的，所以他們把前进叫做“右”，把后退叫做“左”。我們和右派分子是在向着根本相反的两个方向运动着，正是所謂“背道而馳”。

第二，这又是假話。原来右派分子需要給自己塗上一层“左”的保护色。不这样，在現今中国的条件下，他們就会根本站不住脚。右派分子知道，光靠他們自己是不能把中国的历史車輪倒轉回去的。他們必須把自己混在那些从善意出发向党提出批評意見的群众中間以便夺取群众。为着迷惑中間状态的人們，他們首先把自己的臉搽紅，扮得好像是“革命

的”包龙图；然后，他們就把共产党人和非党进步分子的臉塗黑，說他們是“右派”、“保守派”，是“坐轎子”的人和“抬轎子”的人，是“特权階級”和“无耻之徒”，等等。可見，右派分子由于他們自己的反动立場和当前中国的階級力量对比的情况，必然要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必然要把清水攪渾，才好在渾水里摸魚。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辨别方向，对那些缺乏必要的政治經驗的人們說来，特别是对那些灵魂深处还有一个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王国的人們說来，就成为严重的問題了。事实上，有許多自視甚高、看不起工人农民的知識分子，在过去一段时間里，就受了右派分子的迷惑，充当了他們的俘虜。就在現在，也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躲躲閃閃，动动摇搖。这是一番值得十分重視的大教訓。

这番教訓的意义是什么呢？这番教訓的意义就是，为了正确地辨别方向，必須有正确的立場。工人农民的文化虽然还不高，但是他們对于大是大非是很容易看清楚了的。而許多知識分子以及一些青年学生，由于缺乏經驗，由于背着有知識有文化的包袱，由于沒有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在这次的风浪中却沒有做到这一点。这就証明，这一部分人的立場問題还没有解决。

章伯鈞、罗隆基之流慣用甜言蜜語迷感知識分子，說他們用不着改造自己了，已經改造得很好了，說現在的問題只在于共产党是否礼賢下士，三顧茅廬了。这种腔調同章乃器对工商业者說話的腔調一模一样：貌似爱之，其实害之。知識分子在人民的事业中无疑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

有当他們同广大的工人农民相結合的时候才能充分發揮。教育者必須受教育，知識分子必須向工人农民学习。在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禮賢下士、三顧茅廬的問題。如果硬要說禮賢下士，那么知識分子首先要向工人农民禮賢下士；如果硬要說三顧茅廬，那么，在最根本的方面，工人农民更加是諸葛亮。因此，这一类說法只是放在知識分子前进道路上的絆脚石，只是阻碍工人、农民、知識分子相互團結的牆和溝。

人民群眾对于右派分子进行了并且还在繼續进行着大量的批判和揭露。这些批判和揭露，对于暂时迷失方向的人們，正好象投給发燒的病人的一副清涼剂。不是么？在看了这些批判和揭露之后，有些人不免要經歷一陣惘然若失的感觉；但是在这之后，他們却会逐渐清醒过来。究竟哪边是左，哪边是右，对于一切在大风浪里曾經搞糊塗过的善良的人們說来，現在不但是必須分清，而且有可能分清了。这对于我們民族的光明前途，实在是一件了不得的好事。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 應當批判

7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

自本報編輯部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這個問題均有所檢討。

光明日报工作人員开了几次會議，严肃地批判了社長章伯鈞、总編輯儲安平的方向錯誤，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場根本轉过来了，由章伯鈞、儲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

資產階級路綫轉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路綫。由此恢復了讀者的信任，象一張社會主義的報紙了。略嫌不足的是編排技巧方面。編排的技巧性和編排的政治性是兩回事，就光明日報說來，前者不足，後者有餘。技巧性問題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編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讀者是會高興的。這件事也難，本報有志于此久矣，略有進展，尚末盡如人意。

文匯報寫了檢討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寫了許多反映正面路綫的新聞和文章，這些當然是好的。但是還覺不足。好像唱戲一樣，有些演員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裝腔作勢，不大自然。這也很難。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綫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編輯和記者中有許多人原在舊軌道上生活慣了的，一下子改變，大不容易。大勢所趨，不改也得改，是勉強的，不愉快的。說是輕鬆愉快，這句話具有人們常有的禮貌性質。這是人之常情，應予原諒。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名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綫，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別的黨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惡劣。但人數較少，系統

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6月14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基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14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

7日这个期間，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說，共产党看出了資產階級与无产階級这一場階級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发动这一場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对資產階級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組織，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內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說，这是陰謀。我們說，这是阳謀。因为事先告訴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歼灭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于鋤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鋤几次草嗎？草鋤过来还可作肥料。階級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針公开告訴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階級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階級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網呢？他們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階級的絕對优势，看成了絕對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鳴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頃刻大乱，共产党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計。这不是利令智昏嗎？“利”者，夺取权力也。他們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針行事的，它在6月14日却向人民进

行欺騙，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說：“而所以发生这些錯誤認識，是因为我們头腦中还殘存着的資產階級办报思想”。錯了，应改为“充滿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資產階級的方向，殘存着一点資產階級思想，够用嗎？这里是一种什么邏輯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結論，这就是文汇报的邏輯。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导过的違反事实的反动新聞，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論，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編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經作了許多比較認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錯誤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錯誤，就認真更正，表示了這張报纸的負責人和記者們对于人民事业的責任心，这个报纸在讀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責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們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債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債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給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讀者要問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現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沒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轉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認真地照它那样办。

現在又回到“資產階級右派”这个名称。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資產階級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說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現出来了。他們人数极少，在民主

党派中，特別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輕視。这种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动，他們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對他們不适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現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們中許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寬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繼續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則，對他們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論，无行动。言論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寬大些了。錯誤的言論一定要批判干淨，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許有言論自由。一个偉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們的錯誤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們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們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繼續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順利进行了。

論 算 舊 賬

6月14日解放日报社論

陈仁炳提出了算旧賬的問題。据他說，“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需要算算旧賬。陈仁炳要向誰算賬呢？是向帝国主义嗎？是向地主階級嗎？是向長期压迫剝削中国人民的反

動分子嗎？都不是。那是向誰呢？原來是要借整風的機會，同共產黨算一算舊賬。因為，據說“有的犯了錯誤的同志，最喜歡用反對算舊賬來遮掩他自己的錯誤。”你如果不贊成算舊賬，那就無法逃避掩蓋自己的錯誤的嫌疑，而且就無法逃避不“為了黨和祖國的前途”的罪名。看來，舊賬是非算不可了。

我們是不是贊成算舊賬呢？

我們是又贊成又不贊成。

如果說是对敵人，我們是主張算賬的，舊賬要算，新賬也要算；小賬要算，大賬更要算。不但要算，而且要算清，要償還。如果敵人欠賬不還，我們就強迫他還。用嘴講要還，就動手，文的不行，來武的，直到敵人還清為止。在這方面，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一向不馬虎的。這早已為歷史事實所証實了。應當說明，就是对敵人，包括武裝的敵人，只要他放下武器，我們仍然主張不算舊賬，實行寬大政策，給予重新做人的機會，這也是歷史事實早已証明了的。

如果說是对朋友，我們不但不贊成算老賬，而且主張不記賬。因為既然是朋友，就不免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的地方，有愉快的歡聚，又有不愉快的爭執，甚至有甲“得罪了”乙，乙“得罪了”丙，或者丙“得罪了”甲的情況。從這種實際情況出發，我們主張以團結為重，把問題說清楚，不記朋友的賬，友好相處，共同把事情办好。我們的朋友，有的在歷史上犯過錯誤，只要他已經認識了錯誤，並且有了改正，我們不主張算舊賬，團結一致，把共同的事業办好。因為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知道，共產主義的事業絕

不是少数共产党员的私事，在这条道路上，朋友越多越好。如果对朋友記賬，算老賬，是不符合我們的道德标准的。我們有些同志对于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領会不够，对有些朋友抱有宗派主义情緒，这是党經常反对的，也是这次整风中要解决的。

至于講到对我們自己，我們是記賬的，也是算賬的。只要看一看我們党的历史文件，同志們就会看到：我們从来没有掩盖过、隱瞞过我們曾經犯过的錯誤。不但不掩盖小的錯誤，而且不隱瞞我們的党曾經犯过路綫錯誤。不但不掩盖过去的錯誤，而且經常地揭露各項工作中的錯誤，因为我們的党是对人民負責的，所以，不但各个机关經常总结工作，解放以来在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中，我們都不曾忘記整頓自己的队伍，肯定成績，糾正錯誤，不断地从中吸取經驗教訓，把工作作得更好，而在社会大变动以后，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整风运动。因此，陈仁炳提出要算旧賬，我們并不惧怕。我們不但热誠地欢迎一切真誠的朋友所提出的建設性的批評（包括許多不正确的批評），而且信心百倍地迎接任何右派分子的挑战。

現在右派分子給共产党开出了一个賬單。他們說，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的勤劳的斗争是没有成績的，誰如果說“成績是主要的，缺点、錯誤是次要的”，那就是“教条主义”“党八股”，就是“遮掩錯誤”。在他們看来，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了全中国，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統治，实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都不算成績，这都算錯誤；解放以前，中国每年

只生产几十万吨鋼（按国民党中国只生产四万多吨，其余是日本人在东北生产的），現在生产四百五十万吨鋼，这也不算成績，这也算錯誤。这岂不荒唐？其实，也并不奇怪。蔣介石垮台，中国人民看作是大解放，大成績，蔣介石和他的主子則看作是大灾难，大錯誤；土地改革，工人农民看作是很大的成績，地主則看作是下地獄，是大錯誤；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看作是很大的成績，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則看作是很大的罪过。各人立場不同，观点不同，同是算旧賬，却得出两种結果。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陈仁炳还没有公开写出他的賬單，但是他在算什么賬，算賬的目的是什么，明眼的人是容易看出的。君不見，他不是已經在那里“長太息”嗎？如果他算賬的結果，看到了成績，也看到了缺点，他又相信这些缺点是可以克服的，錯誤是可以糾正的，那又何必“長太息”以至想到“痛哭流涕”呢？君不見，他不是已經要求“挑出几个人”来加以“有效”的处理嗎？如果他是从团結的愿望出发，如果他还相信这些同志虽然犯了錯誤，却是可以教育的，为什么他对这些干部是那样地仇視呢？如果說几个干部犯了錯誤要这么办，整个共产党几年来又是“錯誤是基本的、成績是次要的”，那不是也应当“挑出来”加以处理嗎？从他到处热心“算賬”“撤干部”来看，我們这样說，难道是毫无根据的夸張嗎？

我們說我們不怕算旧賬，不怕右派分子挑战，这不但因为我們深信：共产党的成就是算不倒的，因为共产党的工作成就首先是中国人民英勇劳动的成就，人民是看得清楚的，

而且我們深信，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是必須改正，也是完全可以改正的，因為象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等等現象，並不是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本身的產物，並不是社會制度本身的產物，而是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產物，是有它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的。我們對這筆遺產並無任何留戀，我們並不想靠它過日子，而是不斷地堅決地同它作鬥爭。在這方面，我們同陳仁炳不同。我們相信，經過整風，我們一定能够使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污毒大大減少，並且在整風運動結束以後，繼續同危害黨和人民的事業的現象作鬥爭，我們的工作會越作越好。因此，我們在同右派分子的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為作鬥爭的同時，我們絕不停止整風運動，我們歡迎黨外的朋友們繼續幫助我們整風，一切善意的批評，包括不完全正確的、甚至錯誤的批評，我們都會認真地嚴肅地對待，因為這是同那些破壞性的批評有原則性的區別的。

中國人民經歷了偉大的革命勝利，進入了第九個勝利的年份，人民在歡樂地迎接新的勝利，而有人在那裡“長太息”在那裡“痛哭流涕”，這是一筆新賬，還是舊賬，讓我們讀者去判斷吧。

整風的兩條路線

6月15日解放日報社論

關於整風，我們共產黨人提出了方針，規定了辦法，全黨根據中央的方針，開始了整風運動。可是陳仁炳、王造時卻為整風運動規定了另外的方針，另外的辦法。

两个方針，两套办法，二者决不能并存，总要分清一个是非才好。

共产党人的整风方針，是从上而下，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和整风两不误的方針。其方法正如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所指示的，是从团結的愿望出发，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根据这个方法，我們主張整风运动應該是一次既严肃認真又和风細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應該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运动。我們主張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檢查出来的犯了錯誤的人，不論錯誤大小，除严重違法乱紀者外，一概不給以組織上的处分，并且要給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另外一个方針，一套办法，認為共产党人治病救人的原則不能“过份”強調，認為共产党在执行这个方針时，犯了“右”的錯誤，認為我們“无賞罰”“无是非”，只有“姑息”而无“严格的紀律”。根据这种意見，于是就主張惩办，主張把“群众”（这里所說的群众，决不是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識分子，而是他們自己）認為有“显著錯誤”的問題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的”、“公道的”教育和处理。持这种主張的人自封是繼承中国“仁人志士”的傳統，繼承着“讀書人的气节”。他发现共产党的整风方針与他的“志士仁人”的傳統不合，与他的讀書人的“气节”違背，于是提出另一个整风方針。他用了些什么“商鞅树木立信”的故事，西汉賈誼“治安策”的文章，表示若按照他的“意見”“整风”，“整风”就能百分之百地“胜利”，若不按照他的意思办事，就不能“胜利”，他就要和賈誼一样，即

令不痛哭流涕，也不免要長太息了。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为了工人、农民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改变了我国在国际上受尽侮辱，受尽损害的地位，目前则正在改变着国内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就之大，是国内、国外任何明白事理的人所一致公认的。既然成就很大，共产党人为什么还要整风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人决不能由于有了成就而骄傲自满起来。因为我们工作中还有缺点，有错误，因为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起来。中共中央整风指示中说得很明白，“整风为了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人就不能不继续改造自己，继续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主要就是存在一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这些毛病原来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东西。有人说三个主义的根源来自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另有野心，有意混淆黑白，也是丝毫没有科学常识的废话。谁都懂得资产阶级是一个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剥削阶级，是个你争我夺、凶狠竞争的阶级，三个主义的根源正是从这种资产阶级的本质和性格中产生出来的，这个普遍的真理已经成为工人、农民及一切有头脑的知识分子所熟知的道理。可见三个主义是由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子传染给我们部分党员的，我们要整风，就是要

把这些东西整掉。所以整风就是两种思想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它既是思想上、意识上的问题，是精神状态的问题，我们也就主张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办法。

近几个月来，社会上大放大鸣。只要是善意的批评，即使说得有些过火，共产党人也一律采取欢迎态度，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是对共产党人的“围剿”。可是有人不光是大搞其狂风暴雨，而且主张算旧账。他认为共产党人喜欢用反对算旧账的办法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其实这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共产党人从来也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错必纠。我们党的历史完全证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象共产党那样勇于自我批评，勇于听取群众的批评，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个别的野心家如果不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完全无知，就是打算利用我们的个别错误来反对党的领导。其实，对人民有债没有还清的、需要算一算旧账的不是无产阶级，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另有其人。

我们党的整风重点是放在县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因为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首先整顿了作风，改进了工作，就能直接影响其他的干部，按照好的榜样办事。可是有人却要另树别帜，他们主张整风重点，应该放到基层单位去。不错，基层单位的干部，不是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某些基层干部采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办事的也有；基层干部的这些毛病，应该改正，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并不象有人所描写的，基层干部都是“最专横的官僚主义者”，“这些干部阻碍了我们的生产发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

划，損害了我們广大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基层干部縱然在工作中存在某些缺点或錯誤，但絕大多数都是終日辛辛苦苦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們不仅做了許多工作，也确实得到不少成績。对这样的干部，仅仅因为他們有某些缺点和錯誤，竟給他們加上“害党害国”的罪名，真是惡毒之极！我們不大能够理解提这种主張的人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如果不是想打击积极分子和剛入党不久的新黨員，又能作什么其他解釋呢？現在不是有人极力鼓吹什么“党天下”，党不能领导国家之类的謬論嗎？不是有人說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子就是无产阶级專政嗎？要反官僚主义，不反无产阶级專政那还行嗎？我們上海又出現一种“反基层”的主張，不“反基层”共产党似乎还是反不掉的。看来这类主張很象是双管齐下，既打头又截尾，把工人阶级、共产党人来一个从头至尾連根拔除，岂不妙哉！一个反对“党天下”，一个“反基层”，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两种論調，一个目的，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关于整风，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綫，两个方針，两种办法。共产党人主張实行正确的方針，采取正确的方法，走正确的路綫；陈仁炳、王造时所主張的路綫，則有走上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險。这一点难道还不明白嗎？

“政治設計院”

(5月2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負責人第8次座談会上发言)

章伯鈞

“共產党的民主精神已經
得到了極大的效果”

民盟副主席章伯鈞說，今天他談個人的意見：第一点，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談論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見，看来是很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民主精神，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視。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們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問題，引起了很多的討論。就我接触到的朋友來說，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認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認為應該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見。这証明，鳴，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現在應該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談会，感到仍有人沒有把話說完。在一次高級技术人員座

談會上，有人發言後問我到底怎樣，下邊可能顧慮更多。因此，今後應該徹底地廣開言路。現在光是中上層人物的意見，固然能夠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見，但是，還應該普及到下層才好。下層幹部在幾年來對國家貢獻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錯誤。因此希望這次整風能聽一聽基層人民的意見。

“黨內一決定就那么干下去
是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的”

其次，談幾個問題：幾年來，特別是從去年政協會議以後，國家領導方面很重視各方面的意見，民主生活日漸豐富。今後有關國家的政策、方針性的重大問題，可以多聽一聽各方面的意見。如這次整風，結合檢查改進工作，當然是好的。過去，作了許多轟轟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給國家帶來了損失。如果在工作進行之初，就多聽聽人大常委會、政協、民主黨派的意見，就可以少走彎路。如掃盲運動、五年一貫制、推廣雙輪雙鐮犁等問題，如果事先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根據材料，多方面地進行討論，或經過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專家的討論，就會減少損失。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的。又如體制問題、中央和地方的分權問題，去年只交地方黨委書記和少數黨外高級幹部進行討論。主要是黨內討論。應該利用政協、人大的各種委員會、民主黨派去討論，這些人都有相當的認識和經驗。再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却只由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這樣，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黨內的一些同志，大有問題，相當混亂。如果

文字改革問題，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見，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問題，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討論，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討論。

陈夢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見，我部分地同意。

“政協、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
应该是政治上的設計院”

現在工业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个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設計院。应该多發揮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諸葛亮。現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滿，应该展开广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協、人大不要等到期滿，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討論，不能全靠視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有經常的討論。

近来，政協委員到下面視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視察工作，要进一步讓大家經常討論国家的重大問題。

“国务院開會常拿出成品，
这种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說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問題，拿出材料認真討論，有丰富的內容，能够發揮各个人的見解，这种会大家

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問題，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討論，文字改革問題也可以由大家討論。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許多领导同志，有知識，有精力，可否在統一安排的原則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經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換意見，而不要象現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們怎么講，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討論問題，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長出席代表各部說明政策。这不是資本主义国家議會政治。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識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較小的社会知識分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們的問題。

鎮反、三反、肃反中的遺留問題，一再討論，党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中国共产党的統一战綫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經驗还得總結一下。从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論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現在的統一战綫工作，作一个總結，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門的總結的时候，也可以請有关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觀主义的毛病。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平反委員會”

(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

負責人第9次座談会上的发言)

罗 隆 基

罗隆基发言說，最近有两位外国記者到他家去，請他談談对于“鳴”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馬寅初、張奚若发言的意見。他說，他認為这次的爭鳴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見，但并没有人反对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鳴”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同时他还对外国記者說，他認為馬寅初老先生顧慮太多。他不同意馬寅初的意見，他說，在解放初期，許多老教授不能上課，經過学习提高，現在可以上課了。馬寅初說，整风运动以后，許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課。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师經過整风，拋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將來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貢獻。这正是辯証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張奚若的意見。

他說，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說，現在的爭鳴气候好象是“春眠不觉曉，处处聞啼鳥”。他又續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說，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第二，他說，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証，在他們对党进行批評以后，不致在將來受到打击报复。他認為要毛主席出来

講話保證，那是笑話。但他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方案，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為這樣作有三個好處：一、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各地知識分子就不會顧慮有話無處說，而是條條大路通北京了；二、過去的“五反”、“三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有人擔心在這次的“放”和“鳴”以後，還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了委屈的，要給他們“平反”，就可以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的隔膜。他還主張，“平反”的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因為他認為這幾個運動過去是共產黨領導着搞的。“平反”時，除了領導黨以外，還應該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說明運動有成績，也為受了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黨派有，其實共產黨內也有；三、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里不發生打擊報復事件，有這個機構，敢于打擊報復的人，知所畏懼；受到打擊報復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他以為，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因此，他還主張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系統。

他認為共產黨組織是否發展太快了

第三，他認為共產黨在發展組織方面，特別是在發展知識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領導黨考慮的。在解放

后这几年来，党员很快地发展到一千二百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他说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他認為上司太多，
森工部“沒法子有權”

第四，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1956年是“全部的冒进”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那个人的问题，也不是那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

是說的它的表現。這是把毛主席所說的“穩步前進”忘記了的結果。

(人民日報,1957年5月23日)

“定息不是剝削， 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

章 乃 器

在5月31日繼續舉行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章乃器講了話。

他首先談到這次座談會開得很好，因大家都說了真話，把問題擺了出來，這樣就有利於解決。接着他說，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從消滅民族資產階級過程中間，千方百計地想辦法提高工商業者的政治覺悟，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以作到妥善地消滅資產階級，只有這樣才對社會主義有利。

他認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
就能發揮私方的積極性。

他說，對工商業者的改造，不能採取形式主義，有些人自認為立場很穩，口號喊得很響亮，給工商業者“扣帽子”，甚至用打擊吓唬的辦法，壓服他們，結果，使工商業者縮手縮腳，不敢做工作。還有的不敢接近工商業者，生怕玷污了自己。這都是形而上學，沒有真正從工人階級利益考慮問題，因為這樣就談不到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了。

接着他就如何發揮和提高私方積極性談了自己的看法。

他說，這只有六個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為宗派主義者是不願明是非的，他靠顛倒是非來弄權，只講親屬、裙帶關係，只願聽恭維、奉承。主觀主義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脫離了客觀實際，完全憑主觀想象處理問題。官僚主義者不敢明是非，他們心里雖有是非，但怕講出來影響自己的地位丟掉紗帽。他們只知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或者做群眾的尾巴。這三者是互相統一的。

他說：官僚主義是比
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

他認為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資本主義在中國不可能復辟。但官僚主義時時刻刻會在人們思想中復辟。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他說，為什麼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得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於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要盡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卻不能做到這點。他說，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過提拔安排，才能真正發揮工商業者積極性。光“重德輕才、以資代德”就會造成是非不明，調動不起來積極因素。

他說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
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

他說，關於公私合營企業里幾種關係問題，應該明確以公私共事關係為主，階級關係是殘余，因階級基本上消滅。在工作關係中，不應該分公方、私方，黨與非黨；要按職責

和分工办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則工作永远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可以提醒工商业者还有阶级关系残余的存在，但也不能千篇一律，要因人而异。如果一个私方很进步，和公方、职工的关系搞得很好，就不能强调阶级关系。另外，不能说定息都体现着阶级关系，也要看定息收入大小来决定。不能把阶级关系当成一种压力，去改造工商业者，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

他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
而应说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接着他谈到定息的性质。他说，有些人认为定息的性质是剥削，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因为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他还说，二千元的身子，也有重新考虑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个数字太小了，很难划分二千元以上的都是资产阶级；二千元以下的都是小资产阶级。

他还谈到群众观点问题。他说，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尽管每天都和群众在一起，也不会了解群众的情况，这是假的群众路线。他对大家说，对资产阶级要恨，但对资产阶级分子要爱护，要抱着与人为善，热爱群众的精神去团结改造工商业者。

他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
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
他还说，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消灭。

最后，他談到工商业者两面性的問題。他說，关于这个問題，已專門写了文章，即將发表出来。他認為，必須辯証地看待这个問題，經過“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資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強調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說，哪个階級都有两面性，工人階級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問題。他說，資產階級与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階級。但这两个階級的分子不能說有本質的區別。資產階級的剝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資產階級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剝削不是与生俱来的，他認為目前我国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大家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黨天下”

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黨
派負責人第11次座談会上的发言

儲安平

解放以后，知識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領導。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个問題。这个問題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問題上。我認為党领导国

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

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說，現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結党外人士、团結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們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緩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問題，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陈新桂的反动謬論

(摘要)

陈新桂 (民盟后补中央委員)

他在民盟中央小組帮助党整风的組織生活会上說：

“无產階級專政是个‘根’，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將越反越多。”

他所接触的知識分子，对当前“鳴”“放”有五种顧慮：①耽心再有一次暴风雨；②怕变相报复；③怕提了意見沒下文；④怕卫道者，全面論者圍剿戴帽子；⑤少数人怀疑整风有无用处。他說：儲安平提出“党天下”“一党治国”。儲安平的話还没有說完。在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階級專政，是通过工人階級先鋒队——共产党專政。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他还說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愈整愈厉害，无产階級專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將越反越多。

“我國对旧知識分子的利用和
改造是採取了階級斗争的方式”

六月十日，在民盟中央小組的座談会上，他繼續傳播以

上的論點。他說：共產黨執政，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同義語。共產黨在執政時，依靠黨員作核心，而民主黨派和群眾團體是杠桿，傳導帶。這樣一種方式就值得研究。他認為我國這幾年來對舊知識分子的利用和改造採取了階級鬥爭的方式；選派留學生主要看成分，看政治條件，按照無產階級專政的邏輯，這是必然的。這樣做沒有宗派主義就說不通。他認為說專政是對敵人，對人民內部是民主，這說法不全面。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除了鎮壓反動派，還要組織經濟工作、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他認為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用來聯繫群眾的杠桿、傳導帶，實際上是工具，完全被動，不可能發生主觀能動性。

六月十三日陳新桂又在民盟中央小組座談會上繼續發言說：聽了別人對他的許多批評，他一直還沒有搞通。他聲明：他沒有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他的神情沒有錯亂。還重申：他還是認為儲安平說“黨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最終根源沒有什麼不對。不過，他說他認識到他和儲安平的說法的出發點不同。（見6月8日、11日、14日“光明日報”）

葛佩琦的反動謬論

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講師）

他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會召開的非黨教授、副教授、講師座談會上說：

“今天黨羣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
十萬八千里”“統購統銷搞糟了，
所以物資供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

我認為今天黨羣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

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資供应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是过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干部。說良心話，物資供应之所以緊張，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錯誤，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所造成的。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漿，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統治者沒有得到統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們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而不顧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們。例如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們。現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見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覺也是很危險的。

“黨員起了監視羣衆 的便衣警察的作用”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来領導，所以看黨員的成績就是看彙报多少，彙报得多，就是好黨員，黨員起了監視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黨員，因为党組織叫他們作情报，所以責任在党組織，因这是組織給的任务。

“不要共产党領導， 人家也不會賣國”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国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別人多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騷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們，杀共产党人，推翻你們，这不能說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以上見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

“總有一天党会滅亡的”

他还說：群众在鳴放中还有顧慮。这反映了两个問題：一、反映了八年“民主”制度的結果，群众对“禍从口出”有深刻体会，串个門、說句話，就要被写进“材料”中，群众对宪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已經頗感生疏了；二、群众对共产党說的話不敢信任，怕打击报复。如果群众繼續对党不信任，总有一天党会灭亡的。他还說，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这是共产党八年教育的結果，使人不敢說話了。八年来和党来往中，群众深深感到共产党“善变”，遇事能灵活应用；講利害多，講信义少。这从党的政策和党员的言行中都能看出。

“羣衆是要推翻 共产党，殺共产党人”

他說：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別重視。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規律的，只空喊万歲也是沒有用的。

“有些黨員六親不認， 連兒子同爸爸都不接近”

又說：党組織对人，認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对流过血和汗的人关在大門之外，冷若冰霜。有些黨員六亲不認，連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給媽媽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說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又說：一九四九年群众对共产党不会有这么多意見。三害不剷除，狂瀾既倒，挽狂瀾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瀾冲走，葬身魚腹。

（以上見六月三日北京日報及六月八日人民日報）

六月七日葛佩琦在人民大学非党教师座談会上，又对他以上发言进行解釋，他認為大家对他的批評是对他的誤解。他說，我說統購統銷搞糟了，并不是反对統購統銷；說肃反搞糟了，也不是反对肃反，我說話有个习惯，就是不够含

蓄，其实，我所說的“搞糟了”，含蓄一点說也就是“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的意思。（見六月八日北京日報）

王德周的反動謬論

（摘要）

王德周（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

他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召開的非黨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座談會上說：

“黨已經到了面臨危機的時候了”

“黨已經到了面臨危機的時候了！”他說，人民大學是黨員第一，團員第二，民主黨派第三，群眾最差。打掃廁所的都是舊人員，沒有黨團員，這是歧視群眾，把群眾劃在圈外。他說：“現在群眾把黨劃在圈外了。”他認為現在黨員有兩多兩少，多了特權思想和優越感，少了法律感和道德感；以上這兩多兩少結合在一起，老百姓受得了嗎？他說，“老百姓與黨的距離是遠的，這次整風收不到效果是很危險的。”

王德周又說，一般群眾都說黨中央的政策是對的，就是下面錯了！但從豬肉來說，有一個胡同十二個豬肉鋪變成了兩個，豬肉買不到，說生活提高不能服人。他說蔬菜比去年漲了百分之六百。他又說：“老百姓開始對中央不信任了，有些事比國民黨時候更壞。”

“現在黨內有百分之九十幾的
黨員鬧宗派，甚至無惡不作”

王德周接着說：“這次整風要有百分之九十的成效，否則要垮台了！共產黨勝利了，為什麼今天垮得這樣？與其說黨

脱离群众，不如說群众脱离党，現在党快吃垮了。”他还說：現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鬧宗派，甚至无惡不作。他認为什么时候都是武力战胜武力。他說：“鬧事要架机枪，这是可以的，麻煩的是怕机关枪倒过来打。”

王德周还建議由民盟把所有群众組織起来，帮助党整风，監視党整风，以取消特权，达到整风的最高效果。

（見六月六日北京日报）

（以上轉自1957年6月17、18、19日北京日报）

“只提缺點不提優點， 才符合整風精神”

（摘要）

陈銘樞（民革中央常務委員）

他在中共中央統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負責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談会上說：他同意实行校務委员会制度，取消学校的党委制。至于互相拆牆的問題，他說民革方面是没有什么牆可拆的。

（見五月十六日北京日报）

在第二天的会上他申明：說“民革沒有‘牆’可拆”那句話不完整，要求撤回。他說他那句話是就民革在学校中的成員很少，沒有形成牆而說的，不是說民革本身沒有牆可拆。

在五月十六日的座談会上他針對有人說整风不应單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干部的优点說：这与党中央整风精神不符。他說：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評，都談缺点，沒有談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認为这是好現象。

（見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黃紹竑的反動謬論

(摘要)

黃紹竑 (民革中央常務委員)

“黨不應該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

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提出黨政關係問題。他說：我所以提黨政關係問題，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他覺得過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黨沒有通過人民、通過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黨和政府共同發布決定而沒有把黨對各級黨委的指示和政府對於人民的指示分開來，這樣就可能導致人們或某些黨員認為黨的領導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這樣對於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這樣會造成很多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

“‘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成公式，這樣會意味着強調成績掩蓋錯誤”

他還認為：“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經成為工作報告中的一種公式，任何工作報告都套上這個公式，他認為這樣會意味着強調成績掩蓋錯誤，並有造成更多錯誤的危險。他說個別錯誤即僅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績來掩護它，忽視它；就司法方面來說，百分之二、三的錯誤案件，在全國範圍內不知要造成多少人

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說，我覺得宣揚成績、夸耀成績、掩盖錯誤、忽視錯誤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鋪張浪費的來源，成績說得保守一些，錯誤、偏差放在成績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沒了成績，而是成績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績。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績是心中有数，不強調的說，他們也会知道，說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們也会知道的，強調的說，并不增加他們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減少他們好几分的信仰。

（見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龍云的反苏謬論

（摘要）

龍云（民革中央副主席）

“过去幾個大运动都是共產黨整人”

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民革中央小組扩大會議上发言認為整風就是找过去的錯誤。他說，为什么整共产党的風？这联系到有职无权的問題，共产党是执政党，有职有权的人錯誤就多。他甚至認為民主党派的錯誤，也和共产党有关；整共产党的風，有道理。他說，他这次視察回来，在報紙上看到馬寅初、張奚若、章乃器等人的发言，受到很大鼓舞，但自己参加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統战部召开的座談会以后，情緒反而低落了，因为发言的人有保留，有顧慮，折中的話很多。他認為这样下去会冷下来，“沒有作到步步紧，而是步步松”，对中共帮助力量不大了。他認為，有顧慮可以理解。他說，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現在是不是共产

党測驗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他說，現在时机不同了！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讓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見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他認為錯誤和缺點的根源多半是在上面，又說，國務院指示一發就一直貫徹到基層，黨有黨的指示，就成為雙軌並行，沒有注意業務部門的取權

龙云还对共产党的錯誤和缺点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这几次座談会，大家所指出的錯誤和缺点，多半是在下面，而其根源多半是在上面。他認為在国家的行政上沒有做到分层負責，而是国务院指示一发，等于垂直领导，就一直貫徹到基层，党有党的指示，就成为双軌并行，沒有注意业务部門的取權，业务部門也就无法帮助下面，置于可有可无之地，很多錯誤和混乱，便由此产生，对問題不暇再加考虑和研究。

（見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在六月十五日民革中央小組扩大会議上，龙云談到他过去說过“三反”、“五反”、“肃反”等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他現在認為这說法是有“毛病”的。

此外他还声明他以前說欽佩章伯鈞等人的发言只是欽佩他們发言的精神，欽佩他們在整风开始时起帶头作用，不是欽佩他們的講話內容。現在才发现章伯鈞的說法是沒有根据的，是超宪法、超政府的。（見六月十六日北京日报）

在最近一个重要會議上他发言認為：（一）抗美援朝战争的經費，全部由中国負擔，不合理。（二）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給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国不要他們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几十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結果如此。（三）苏軍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四）我国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紧压縮对外的援助。

（見六月十九日北京日報）

陈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 宣傳工作會議上的書面发言

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員，我以最大的忠誠拥护党的整风运动。党这样地以最大的热忱和虛心，征求各方面的批評意見，这样的严格对待自己的精神，是偉大的。昨天新民报标题标得很好，它說，代表們“向党傾吐肺腑”。我有这么点感想，如果在各个基层工作的广大党外群众，平时也都可能象我們这几天一样，向基层的党組織和党员同志們无拘束地吐出自己的肺腑之言的話，那么恐怕这几天有許多篇发言就根本沒有必要了。因此，我們可不可以說，目前的大問題仍旧是如何鼓励各方面基层的群众打破一切顧慮，在每一个角落特别是不少的死角里鳴起来放起来。

我还有这么一个感觉：这几天所听到的鳴和放恐怕还只是上海各个角落應該鳴應該放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上面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不是还有人在

那里压制批評，遮掩錯誤？希望領導上普遍地去檢查一下。

我听到很多同志表示对于搞好这次的整风抱有充分的信心，就感到兴奋。可是，在听到另外一些不合理的情况反映到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心头非常沉重。例如，昨天我们听到的中小学教师的长期以来不得解决的忙乱问题，可怕的健康问题，令人痛心的党群关系问题，等等，我就感到非常沉重，难过。

汉朝有个人叫贾誼。贾誼曾经向当时的皇帝上了一篇文章叫做治安策，拿今天的语言来说，他里面谈的都是当时社会政治内部的矛盾问题。贾誼把他的材料排了个队，哪儿椿是令人痛哭的，哪儿椿是令人流涕的，哪儿椿是令人长太息的，又有哪儿椿是叫人感觉很不合理的。今天，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本质上当然完全不是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在听大会发言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地在把我听见的各种情况在那里排队。我不敢一定说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是实在太多了。

怎样消灭这些毛病呢？怎样解决这些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呢？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帮助党完成这个任务，特别是怎样打消党与非党隔阂，改进党群关系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想特别对于这一部分的问题贡献一点浅见。

首先，我有这末一个看法，我认为改进党和非党关系和解除顾虑、鼓励鸣放，是一件事的两面，是互相联系的，是可以齐头并进，而不是一定要分作两个阶段去做的。我认为，在今天若干岗位上，不健康的党群关系固然一定会妨害鸣和放，但是如果不开始争取鸣起来，放起来，这关系就永没有改进的希望。反过来说，如果能先在党群关系上，具体

解决几个問題，作几件使群众信服的可能做的事情，也可以自然地解除了放和鳴的顧慮。

分析一下目前存在的放和鳴的顧慮，不外乎以下六点：

一、怕报复打击；二、怕党和政府沒有决心糾正錯誤，改正缺点，反而因为提意見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評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塊挪不动的石头，批評由你批評，而不发生糾正錯誤的效力；四、怕所提的意見不全面，反被領導上拿“兩点論”来加以駁斥；五、既然提的是缺点，怕被領導上認為就是否定成績；六、怕領導上批評你是在算旧賬。

我以為，在今天，为要达到鼓励放和鳴的目的，党領導方面有必要在群众中建立这样的認識：党和政府是有决心貫徹整風的，提意見虽然應該尽可能的多面、全面，但決不怕片面。在整風中是應該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錯誤的，決不要拿“抹杀过去成績”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

从上面講的出发，我想进而补充几点不成熟的看法，我相信是对加强党群团結有好处的。

（一）今天存在群众中的顧慮，其中一部分是有一些客观上可以理解的道理的。部分群众在过去可能有过这样的一种不幸的經驗，对于某些犯严重錯誤的黨員干部，提了多少意見，还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后来，你說这个人經驗主义也罷，他自然免开尊口了，不去自找麻煩了。

古时候有一个商鞅树木立信的故事。我向党提出，在整風的过程中，最好在不太晚的阶段里，把群众認為有显著錯誤的問題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的、公道的教育和处理，这对于鼓舞放，会比几篇解放日报社論还更有說服力量和动員力量些，当然我不是說社論沒有它的作用。

(二) 其次，我还有一个看法。我以为在检查缺点，明辨是非，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旧账不是不可以算的。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账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算账而算账，不是一种“算账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账（如果有这样的账），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三) 再其次，我以为今天群众对于党的党内干部政策，是有一种误会的。也可能党在这方面，确有应该加以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说，毛主席多年倡导的治病救人的道理，反对单纯惩罚主义的正确原则，是不是在执行中有偏右的情况？是不是可能由于过分强调治病救人而弄到在某些具体情况中无赏罚、无是非，只有姑息而无严格纪律？这可能只是我作为党的外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种顾虑。近来各方面常听到党内同志受奖表扬多而批评很少有份，是否事实？我以为，惩罚主义是不好的，但今天搞好党群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恐怕是一个认真执行纪律的问题，在同样情况的错误之下，党员与非党员应负平等的责任，这也是党员与非党员在法律与工作纪律和财务责任之前应该平等的問題。群众心目中的党员有特权的看法或者与这一点有关系。

(四) 我因为热烈爱护党，所以提了这些直率的想法。群众对于党是忠诚爱护并且拥护的，但是对于部分以特权人物自居的、充满骄傲自满的同志们，却是已经失去了信仰。这是一个疙瘩，这也是一个关键。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最好方法，就是向这些党内同志们大喝一声：同志，你必须改走另外一条道路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今天在不少的

大学、中学、机关、医院、企业里，确实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党员同志，你说他故意把工作弄坏也是冤枉，他基本上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他沾染上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灰尘。他入城已经好几年，但是对于无论那一门业务都不大去钻研。一句话，供给制或者变相的供给制害了他，使他变成一个思想懒汉。在社会主义之下，一个党员再不努力一些也没有失业的危险，或者反而要连升三级也说不定。对于这样的同志，我们希望党加强教育，这对于解决很多单位中的党群关系问题肯定也有好处。

检查我自己，我在民主党派工作中，对于党整风一定能得全胜的信心，还是不够坚强的，对于鼓舞我们的成员帮助党整风，努力也是不够的。昨天晚上，我们一位盟员（一位著名作家）坦白地对我讲他对整风信心不够。他说：在某个角落里宗派主义很严重，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他信心不够，他要求见柯老请教，希望从党的领导同志得到前进的力量和鼓舞。我在这里替他转达一声。我诚恳希望通过这次整风，我们能比较彻底地解决一些人民内部重要矛盾，扫清党群团结的障碍，消灭那些可以痛哭流涕和长太息的毛病，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陈仁炳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原载解放日报）

王造时在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这些天来各方面的放和鸣，尤其是在我们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放和鸣，表现了两件伟大的事实：一、中国共产党

的大公无私精神；二、中国知識分子的特殊优良性格。

作为一个开国当政的党，主动地、及时地运用大力，在全国範圍內，来推动这么一个全面揭露矛盾、公开批評思想和工作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它具体地說明了党在重要关头是有魄力給予人民以应有而必要的领导。党的威信在全国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沒有減低，而且更大大地提高了。事实的发展証明了那些怀疑群众路綫的人們是完全錯了。大家把心里头的話吐得越淋漓尽致，大家越体会到党究竟是我們自己的党。党的领导决定了“只有放不能收”；这个决定是英明的。党越讓群众鳴得彻底，鳴得毫无阻碍，党的威信就越巩固。

有个时候，另有一些人怀着另外一种忧虑，忧虑上面尽管放，下面却鳴不起来——盖子尽管揭开，可沒有人要伸出头来。这个估計也証明是錯了。10多天之内，大家已經鳴起来了。当然这还仅仅是初步的开始。可是这初步是偉大的。在这春风解冻的今朝，我們各部門的知識分子所放出来的多多少少大胆直言之花，是值得我們驕傲的。它不但反映他們突破了顧慮，对党 and 党的政策完全信賴，而且充分表示了中国今天的知識分子是有能力，有决心，繼承祖国几千年来讀書人气节的优良傳統，繼承五四以来的革命的爱国精神，勇敢地响应了党的新号召，来推进这一个充滿历史意义的新任务。他們信賴了党，党也应该信任他們，我相信党也一定会信任他們。我建議，党根据扩大信任一視同仁的原則，把党与知識分子的关系，从各方面研究，切实加以調整和安排。我深深感觉，我們中国的知識分子，作为整个的阶层来看，确是有着毛主席所說的志士仁人的傳統。这个傳統是我們保

証社会主义建設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对它估計不够，党今后应当更多多加以爱护。我們大家爱国爱党爱自己，也必須把这傳統更大胆地加以发揚和光大。我們今天的責任，是要本着搞好事情的精神，繼續放鳴，彻上彻下的放鳴下去。

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現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剛剛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說来，越往下层，越是專橫，違法乱紀的事情也越多，它阻碍了我們的生产进展，影响了我們的建設计划，損害了我們广大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官僚主义者的行为，不管是有意或无心，实际上等于假借党的威信和国家的名气，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正如周总理所說，官僚主义者在党与群众之間筑起了一座牆，挖下了一道溝，弄得爱国爱党的人，尽管滿腔热誠，想为社会主义建設尽其一磚一瓦之用，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擋在牆溝之外，凄惶失所，想不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国家有前途而个人沒出路。官僚主义不鏟除，党的威信必定受損害，社会主义建設必定大大受阻撓。

放鳴不是发牢騷，是对官僚主义开刀的第一步。前途是有困难有阻碍的。我們中間还存在着顧慮。特别是基层干部有沉重的顧慮；基层群众有更沉重的顧慮。到今天为止，来自基层的呼声，还是稀少而微弱得可憐。我們难得听到成千成万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呼声；我們也难得听到各机关小职员及各店鋪小商人的意見；尤其是我們还难得听到千百万的工人和农民的心头話。今天我們可以摸出这么一个放鳴情况的規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放鳴，越不知道如何放鳴；越到乡村，越不敢放鳴，越不知道如何放鳴；也就是

說，哪里最沉寂沒有聲音，那里的官僚主义就可能是最弥漫。因此我認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我們应当把这放鳴运动及时推行到人民生活和生产各部門的基层單位上去。在这点上，党是一定有了統筹兼顧的計劃和步驟的。但是我还深深覺得問題不仅仅是把运动推行到基层單位，而是从作为整个运动来講，放鳴的重点必須放在基层單位和基层群众上去。这不但因为基层群众占全国人口的絕大多数，論理應該受到注意；更重要的，在基层里牽涉的面最广，事最多，情况最复杂，本来就不容易搞好；而不幸基层的干部，一般說来，水平比較差，官僚主义犯得也就特別厉害，群众生活和生产上所受到的損失和痛苦也就来得特別深，特別重。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基层群众有苦說不出。基层的矛盾不揭露，不解决，其它的揭露与解决都是表面的。因此我要郑重再重复說一句，重点必須放在基层單位上去。

发动基层的放鳴，最重要，却是也最艰巨。基层群众是特別需要党的領導，也需要我們大家的帮助和鼓舞的。因此我建議：（一）在基层里必須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由高級的第一書記亲身出馬指导，并会同有关的高級党政負責同志，及党外有代表性的人士組織若干审查团，选定重点，輪流視察、审核。作为一个大学里的教学工作者，我觉得中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中小学办不好，大学教育是无从办好的。在这个放鳴运动中，大学工作者特別有义务，有需要，給中小学的弟兄工作者以积极的支援。（二）有一支生力軍，我認为應該特別加以运用的，那就是新聞界的工作者，我觉得在这次运动中，新聞界的同志們勇敢而切实地做了极可貴可敬的开路先鋒的工作。讓他們在党的领导下，下

厂、下乡、下外县讓春风还吹不到的偏僻角落，可以得到他們生花的笔杆来替千千万万有苦說不出的劳动人民訴說他們的心情。

最后我想說的，放鳴的作用是揭露矛盾；揭露的目的是要解決問題。党方面是充分注意到解決問題的，并且号召了干部在这次运动中对本單位的矛盾要尽可能地边发现边解决。我想，解决要求其快，但更重要的，解决要得其当。解决不得其当，等于制造一个新矛盾。党这次大可以切实扩大集思广益的範圍。大家共同发现的矛盾尽可能由大家共同来解决。理由是：一，多方商討，可以增加解决得当的机会；二，共同商定也可以分担解决后果的責任。因此，我建議两点：

（一）进一步发挥統一战綫的作用，在这次运动的各个阶段中通过各級的統战机构，动员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力量来切实参加审核这次各方面所提供的資料，并共同磋商解决的方針和办法。

（二）認真听取并采用專家研究的成果。許多問題不是凭常識，更不是凭教条能解决的。需要的是細致的科学研究。我們要相信科学，相信學問，相信專家——特别是本国的專家。不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在社会科学方面（例如政治学，包括行政管理学，法律学，經济学，社会学等等）如何延攬我們的老成学者，委托他們切实联系各部門的实际，研究并提供方案以备採納。

我認为这次宣傳工作會議开得非常好。被邀参加的人无論在小组或大会上說的話，都非常宝贵。可惜許多同志，还未得机会在大会上发言。我相信这些都是心血之作，都是有

代表性之見。不僅黨要聽，大家也切望能看到。我建議將所有未經聽過的發言稿，連同已經聽過的，全部印成文件，分售與我們參加會議的人，讓大家好仔細研究，個別提出具體辦法，來幫助黨和政府。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我們放了花，為的是要結成果。我們此後結果不結果，不但全國人民都迫切期待，全世界的人也都在密切注視着。我們絕不可變成無果之花。在黨的培護下，我們必定要做到朵朵的花都結成好好的果。

我衷心祝大會勝利。

（原載解放日報）

孫大雨如此談人民內部矛盾

昨天我參加了外文系的座談會，今天未來之先，有人勸我不要來算了，怕我身體吃不消。響應黨的整風，我就是走在路上跌交、摔死也要來的。

聽了毛主席兩次講話的傳達，我体会到有兩種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今天，敵我矛盾已經不占重要地位，因為封建階級已經消滅，地主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企業已經公私合營，資產階級也在改造中；抗美援朝戰爭在三八綫上宣告停戰後，對敵鬥爭也告了一個段落。內部的反革命通過1951年的鎮反和1955年的肅反運動，現在已經基本上不多了。是否沒有反革命呢？還是有的，不過數目沒有那麼多，有一兩萬或幾千個，不算稀奇，內部壞分子也還是有。

至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現在正在整風，整領導，有些是思想、作風、品德上的毛病，這些毛病從輕微的到嚴重

的，但基本上是好人；还有的是能力差、知識不够，經驗差；还有是制度方面的問題。

今天整風整三大主義，三大主義是不是僅僅內部的呢！我看外部和內部有時是結合起來的，外部敵人有時在內部，我們分不清，他跟內部有些人的種種缺點、毛病結合起來，就會造成種種問題。敵我應該是很分明的，可是他們有密切的關係，一定要分開，有時可能，有時不可能。

有些暗藏的外部分子幫助內部的好人（黨內的和黨外的）製造三大主義。那些壞人有些是混入黨內的，有些是包圍黨的，他們利用三大主義，擴大黨與群眾的矛盾。很顯明的，從匈牙利事件中可以看到。霍爾蒂分子統治了20多年，他離開了以後，留下來的有的混入黨內，有的在黨外擴大黨和群眾的矛盾，使得黨和群眾對立，到那時候一哄而起，群眾就反了黨。中國毫無問題有这样的情形，只是沒有爆發出來。毛主席很英明，看得很清楚，與其鬧大民主，不如開座談會，來搞小民主，好象搭七巧板一樣，搭起來排排隊，把問題分析清楚，就可以搞出問題來。虽然是內部問題，有些是真正的內部問題，有些是外部的人藏在內部搞出來的。他們用各種方法拍馬、誹謗、造謠、誣蔑，對好人排擠、打擊、傷害，把自己的人捧出來，鑽進黨。

上面談的是原則性的意見，現在要談談復旦的具體問題。解放前，復旦有個公館派，這是CC在復旦作為培養CC走狗的根據地，在章益底下培養了一批人。這些人有的離開了，有的至今還在發生作用。還有一個文摘月刊，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搞的，性質是反蘇反共的，復旦有一些人在其中做編輯等等。公館派和文摘派是差不多的東西，但是有區別

的。公館派不一定是每个人給文摘写文章，文摘派也不一定是每个人和公館派對的，但是有密切联系的。都是以章益为头子。这是历史問題，要講历史唯物論，一定要講历史，檢查过去，方才知曉未来。

再講高教局陈其五局長。我起初对他没有什么成見。我从認識复且前党委書記李正文起（他本来是解放前大学教授联誼会的7个干事之一，后来是9个干事之一，我也是当中一个干事），我感到他在解放前基本上还是好的。解放以后，有具体事实，这些事实可以談10小时到15小时。1952年思想改造前，在2月1日到10日，开华东高教界思想学习代表會議，复且大約有30个人参加。今天在座的还有不少人。李正文在这个会上勾結了公館派分子章靳以造謠、誣蔑、搞陰謀活动。我和陈子展、張孟聞等其他一些先生把他們勾結、造謠、別有用心的陰謀揭露了。他們造陈望道校長的謠。說陈望道在重慶帶領特务逮捕进步学生。我說如果有，陈望道不能做副主任委員，如果沒有，要章靳以对質，一对，証明是造謠。李正文和章靳以是勾結起来的。后来，李正文来复且領導思想改造，重点的重点就是張孟聞、陈子展、孙大雨。最近市政协調查徐汇区打击报复的事情，說沒有証据。打击报复的人是不会說自己打击报复的。李正文就是打击报复，过去对公館派有意見的，和革命有若干关系的都被打了，被戴上了莫須有的帽子。

1954年9月24日，华东統战部召开會議，因为华东行政区要撤消了，还有是党中央发现了高饒反党事件，所以要大家反映意見。在会上我就揭露了复且的情形。当时参加會議的分成文科、工科、理科小組。我在会上說：复且在李正文

领导下，反动残余复辟（去年12月20日，我在市政协会议上曾举了很多例子，說李正文和高教局主任曹未风如何勾結（曹未风和軍統特务王芃生有关系），进行打击报复。思想改造中，对革命的人都打，对公館派、地主惡霸之类，都保护过关。他們一面对好的人穷打，一面对有問題的人——肯定是文化系統的特务而包庇过关，并以这些包庇过关的人来打好人。我說这些話的时候，有一些分子很震动、很惊恐、如果他們沒有問題，为什么惊恐呢？問題从复旦公館派开始，但是問題不仅如此，我当时說，這個問題很严重，和上海整个高教界有关系，李正文虽然是代表軍管会来接管复旦的实际上是代表自己接收复旦的公館派的反动集团。这个时候，陈其五的面貌还不太清楚。

1955年2月，我写信給陈市長。因为我在协商会议上，看到市人民委员会的名單，我有意見，就写信給陈市長，揭露潘汉年有問題，他搞一个丑惡分子集团。上海統战文教工作搞得很不好，潘等应負責，如人民委员会的某某人等，就是丑惡分子集团中的人，是潘汉年扶植起来的。陈市長在2月9日邀我在文化俱乐部談話。当时在座的有柯庆施、刘述周、陈其五。陈其五一見我就說：你反党、反政府！你跟張孟聞、王恆守、陈子展反党、反政府！陈其五并且不止講了一次，講了四五次，我可以要陈市長和柯書記作証。我說：“這問題很严重，你有什么根据？”他說：根据很多，現在不可以給你知道。陈市長当时也批評我很厉害，柯書記說我鑽牛角尖。陈市長最后又对我說：我們是朋友，我今天代表党来批評你，是很温暖的。將來絕不会有任何人对你打击报复。

1955年7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潘汉年是反革命分子，我叹了一口气。我早认为潘汉年是反革命分子没有错，我坚持了。可是，在肃反中，把我和张孟闻、王恆守都当为重点的重点。陈子展没有参加肃反运动。张、王两位都是在华东统战会议上揭露潘汉年的，王恆守揭露潘汉年在解放初在国际电影院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全杀掉也没什么。我记得，这件事张孟闻在大组彙报的时候都谈的，并说曹未风和复旦的宗派有关系。就因为这样，我们三个人在肃反中变成了重点的重点，变成反革命。这个重点是在党委书记杨西光副校长主持下搞的。

8月20日，外文系党支部書記通知我要我检讨。在8月10日肃反学习小结时，我曾说：对系里的有些人，如杨豈深、全增嘏、李振麟、龙文佩，大家是否提些意见，帮助帮助他们，他们有点宗派关系吧！结果不是帮助他们，反而帮助我了。8月23日，曾经帮助了杨豈深一次。系内宗派分子之一索天章在思想改造时曾经坦白系内有小集团，是杨豈深、全增嘏、李振麟、程雨民等。现在外文系可不止这些人了。帮助杨豈深是放在橱窗里的点缀品的。开会前党支部書記提出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今天提意见，对系主任杨先生不许人身报复，假使有人进行人身报复，主席有权制止他发言。党支部書記说话的时候声色俱厉，完全是法西斯面孔。当时王零同志也在场的。王零同志就说：这三条不当，大家可以自由发言，高级知识分子有人身攻击完全可以讲出来的，不要有什么限制。从这证明党支部書記謝受康的威势，当时大家都不敢讲话。

第二天，对孙大雨帮助了，从早上八点帮助到晚上八

点。事先布置了很多人，开了很多次預备會議，收集了很多資料，歪曲捏造。打手是助教黨員龍文佩，造謠污蔑。比如說孫大雨講中國共產黨認為統一戰綫不要了。我沒講過這句話。又說孫大雨曾經說自己的馬列主義水平很高，共產黨內只有周恩來總理有資格與他講講話。謝受康還說孫大雨講蘇聯專家造的發電廠發不出電。事實是這樣的，54年我視察污水處理問題，污水處理廠旁邊有個無線電台，那里造廠是不適當的。人家說這是蘇聯專家講的。我問：蘇聯專家知道這里有沒有無線電台嗎？回答說：他不知道。我說：那是你們的錯。肅反中徐燕謀來我這里，說這是打擊蘇聯專家。去年年底市委書記魏文伯同志說，肅反里搞你反對學習蘇聯，你基本上對的，是運用了毛澤東思想，他們錯了。徐燕謀和黨支書串通了，說我講這樣的話。我早知道這集團已超過公館派，上海各方面都有這集團的人，復旦也不止一人。到了10月中旬，我由於身體不能支持，大便出血，不能睡覺。我知道這個集團如何打擊我，我也不制止他，讓他報復五、六次。9月初陳望道先生從北京回來，問王零同志：孫大雨的檢查怎樣了？王零同志說已經結束了。這是他公開代表黨委會說的。但公開說的是一套，黨委會內還有私的一套，那就是楊西光書記指使謝受康做的，在9月中旬又重新搞我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態度問題，搞了六次。我就去看楊西光書記，問他：“肅反是黨委會領導的，我要請問這樣做的目的要求是什麼。”他說：“就是要你檢討。”我說：“什麼原因？我已經檢討兩次了。王零同志已經說結束了。”他說：“陳毅同志要你檢討。”我說：“有過的，是2月9日要我反省，那是因為我對潘漢年提了意見。可是一兩周後，陳毅同志在一個

会上曾說：党外同志对党內提了些意見，这做法是好的，党內外同志互相切磋，將人民的事情搞好。可見陈毅同志要我檢討的說法早已修改。你可能不大了解，不然可以問問柯庆施、刘述周、陈其五等同志(陈其五可能不知道了)。”他很窘，过了五六分鐘，又說“陈其五同志也知道的。”批評了潘汉年也不算什么罪过，潘汉年在7月16日已被宣布为反革命，潘汉年已經不是党的人，而是反革命。楊西光書記就又說：“群众对你有意見。”我知道当时要我再檢討，群众已不发生兴趣。他所說的群众，是群众中的几个，是他自己。我就說：“我的思想水平到此为止，当然不够前进。我要求你布置下去，要楊豈深、仝增嘏、李振麟、龙文佩等人都作深刻的檢討，到群众滿意为止，我可从中学习，再作檢討。”你們不会想到，楊西光書記馬上轉成笑臉，說“孙先生肯定是我們的朋友。如果你說差不多了，那不要你檢討了。有什么問題，可以找我和王零同志直接联系。”我要楊豈深等檢討，他就不要我檢討了，因为楊豈深等是公館派，一檢討，群众发动起来就收不住了，不得了了。于是孙大雨本来是敌人，也变成我們的朋友了，也就不需要檢討了。

思想改造后，院系調整时，薪水从折实單位改为工資分。有一些人包庇过关的、做打手的，都加了薪，从几十分到一百分。其他也有加三、五分，十分、八分的，点綴一下。

去年評薪評級中，大家記憶猶新，其中有很大的不公平。凡是集团里的人都提高一級。凡是反对这集团的人，都降低一級。故我立場站得非常明确的。第三种是他要拉攏的，也不是他們內部的，只好不高不低。虽然陈毅副总理在

55年2月9日曾經在柯庆施、刘述周面前保證过不打击报复，但到楊書記手里又打击报复了。而要他所保护的人作檢討，他就不打击报复了。

这些事情，今天講的一部分材料我在12月20日上海市政协会上发过言。有些人說我錯誤的。这里有几种人：第一种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者，被坏人包圍了，欺騙了，蒙蔽了。第二种是坏人，起来反对我，我受的压力很大。我早已有决心，將我的生命貢獻給中国人民。我的生命不值錢，但我只有一个生命。而我，多大压力也不怕。3月8日，毛主席講仁人志士很可貴，以章太炎为例。王恆守先生剛才講到李云揚司長認為硬骨头要不得，但毛主席認為硬骨头是对的。当时批評坚持学习苏联結合实际的人不好，我看这样的硬骨头多些，人民的事业就会好些。再談打击报复的事情，去年8月間，張孟聞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透露了一点消息。解放日报的集团分子就和学校內部的集团分子勾結，（我相信解放日报也有这种集团分子）对張孟聞圍剿。其中有教授，有学生，有職員。写信的本人如何我不大清楚，也許是好人（在沒有証明是坏人前，應該說是好人，但被用作工具了）。这件事就不能揭露，揭露了潘汉年，在肃反中就受到打击报复。这些讀者来信据說是学校里鄒劍秋搞的。新聞日报9月份有篇社論講王恆守（沒有指名）主張教授治校是反对党的領導。新聞日报內部也有这个集团的分子。这些都是有人有事，逃不掉的。

（解放日报編者按：孙大雨在这里說的集团分子，是指什么集团分子呢？他曾在去年12月的市政协會議上发言時說：陈其五、李正文、楊西光、曹未风以及章某、漆某、楊

某等人都是反革命集團分子。因此，他所指的解放日報內部集團分子也就是反革命分子了，這些反革命分子控制了解放日報的一些工作。如他所指的，解放日報發表了批評張孟聞的讀者來信，就是這些反革命分子活動的結果。）

整風要很徹底、挖到最後的根。黨內黨外的都要挖出來，要對人負責。新聞日報說：有人將人民內部的事情說成是人民外部的事。漆琪生還說，對我的發言要到法院去控告。我等到這個時候還沒看到他控告，希望他早些去控告。上海的事情很複雜。馬列主義要看全面的。最近揭露文化領導有問題，也不簡單。宣傳會議上有人想將這個掩蓋起來，這只能騙天真的人，明眼人看得清。剛才兩個人說到復旦的命名問題，院系調整時我就提過這個問題，合併這麼許多學校，應該叫上海大學，不應該叫復旦大學。現在看：這是有原因的，校慶改在5月27日也是有原因的。復旦是陳立夫培植特務走狗的地盤，5月27日是特務對復旦進步學生大打出手的日子。要反革命，就要這名字，就要這日子。

我的講話可能是片面的。只有上帝才能全面。真正的全面很難做到。我的發言只能代表我一個人。（這是孫大雨在復旦黨委會召開的教師座談會上的發言，原載6月8日解放日報）

希望檢查歷次運動的合法性， 尤其是肅反運動

楊兆龍

今天黨的整風是在什麼情況下進行的，希望黨員都能理解，我們黨外人士也要了解。剛才楊副校長講過去在民主革

命运动中党外人士也出过力，流过血汗，大家都很有感动，我也很有感动。这一点，领导同志了解，下层不了解，愈是下层，愈不了解。院系调整时本人不敢来复旦，以为复旦馬列主义水平高。现在看下来，这不是馬列主义，而是教条主义。复旦的教条主义很严重，过去我在的外文系严重。现在我在的法律系更严重。如讲法律是阶级镇压的工具，这定义今天是否要改一改？中国今天镇压对象只有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要不要法律？可见法律又是同一阶级内部维持纪律的工具。但在法律系我不敢多提，不然修正主义的大帽子要压下来。“再论”出来后，法律系除了教条主义外，又多了个修正主义。本人写篇文章，有些创造性，党支部书记就写文章戴我个修正主义的帽子，我这个刚翻身的教授，实在吃不消。还有，青年教师把老教师到底当作什么人看？当普通人、特种人、或是快要死的人？这几年优待给些肉吃吃算了呢，或是你还有十年好活先给草料吃吃。这样待人太不人道，太残酷。人总是要老的，你们也要老的。理科教师也不要神气，十年之后红色专家出来会接替，已有党员干部不小心流露出来，这也很残酷。在军代表接收学校后，非党老教师的团结就成问题，因为党团员鼓励有方，要你提意见，让你狗咬狗，这种情况到肃反时达到高潮。这对青年一代教育很不好。今天请青年人做座上客，过去打入冷宫的，今天报上又出现了，今是昨非，青年脑中转过弯来。这样的错误以后不能再有了。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确有架子，尤其是学校里负责的党员同志，和人一桌吃饭，出去就不认识，这对年青党员影响很不好，党的制度也有问题，民主集中制，事实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党员没有独立思考，光奉命办事。这

种作风帶到系里来，就如小媳妇出身的婆婆，虐待起人来更厉害。

另一个大的問題，是解放来历次运动的成績到底如何？有好有坏，不能都肯定，如法律系就是本校办得最坏的系，是公安机关、法院的作风。所以，不能說成績是基本的錯誤是次要的。如都肯定成績，还檢查什么錯誤。要檢查錯誤，希望檢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合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有法院檢察院在，要法院檢察院是干什么的。其次，还希望檢查一下有无坏分子乘机报复。

此外，对評級評薪和工作安排希望也認真檢查一下，有那么多安排不当的人。法律系有教授参加科学討論會，系里报作教員，問人事处，說是校長沒有批下，校長日理万几，人事处是干什么的。許多制度也要研究一下，教授看病也有两种待遇，問人事处，說是限于制度，无法变动。而有的制度，又可大开其后門。这些事实是有思想根源的，这就是：看人打发。（在复旦教师座談会上的发言）

我看高等教育工作（摘要）

王 恆 守

我認为在目前的教育工作中，存在着很严重的缺点：第一，教育改革到今天，將近五年，我們还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总共要讀十七年之久（医科还要長），为世界各国所沒有，苏联只要讀十五年。如果讀完副博士学位，还要加讀四年。从各方面来看，我不相信中国青年都是低能儿，为什么要讀那样長的时间？培养一个

大学生以每年国家負担八百元計算，多讀一年国家要多化多少錢。在不降低质量的前提之下，縮短一两年讀書時間，符合精簡節約的原則，不是應該考虑的嗎？第二，目前各級学校的課程大家都反映分量过重，上下不很銜接，学生讀得很苦，还是感到模模糊糊，概念既不清楚，內容又不巩固，要求他們独立思考，也沒有時間来接受这种訓練。各級学校的培养目标和要求也沒有明确規定。例如在高中阶段應該把培养重点放在本国語文、政治理論、一种外国文和初等数学上，但是現在的高中毕业生对这几种基本課程都沒有認真学好。到了大学已經沒有功夫再来訓練語文，因此影响了閱讀和写作能力。大学里的課程不在多而在精。近几年世界先进各大学的培养趨勢，都着重基本課程的訓練，正如毛主席的指示，“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的精神一致。可是現在各專科大学也好，綜合大学也好，各系課程計劃和教学大綱，不頂合适，改而又改，始終沒有摸到头緒。生吞活剝的学习苏联，效果也很差，充分証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害人。第三，高教系統的行政領導至今职责不明，一切由高教部指示，校長无权，教授听命；專科大学且由几方面領導，令出多門，財物和人才的調配彼此爭執不讓，或則都不負責。第四，課程改革以后，思想工作本應該提高到首要地位，不分男女老少都应彼此互相尊重，各人的思想、业务和生活习惯虽有不同，但至少沒有階級矛盾的意味存乎其間（极少數的反革命分子除外），为什么目前老少之間会产生那样显著的隔閡？其中有很多原因，希望各級領導作一次檢查。此外，在院系調整的时候，把有些大学拆散，理工分家，重視工、医、师范，輕視綜合性大学，这些措施都應該重新考虑。

以上許多人所公認的缺點，我曾經在去年冬季的視察會上向上海高教局提出過以下的意見：（1）我反對高教局所作的公式化報告，說“成績是肯定的，是主要的，缺點是有的，是次要的”；因為照這樣說，就沒有正視缺點，因而也就不會糾正缺點；（2）高教系統大部分缺點應由中央高教部負責，希望轉達北京；（3）總起來說，這幾年來高教系統的行政領導，三級制和二級制，校長制還是集體領導制都還沒有劃一規定，校長以下的編制和職權也沒有制定出來。犯了一個“亂”的毛病。業務領導方面，如生硬地學習蘇聯，修訂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工作量制度，口試制度等都弄得很“糟”。在思想領導方面，導致老少之間的矛盾，造成愛聽好話的惡習，弄得很“偏”，上海高教局應該好好檢查。（4）我有一個科學預見，將來大學里必然要做到“教授治校”，因為全世界的先進大學的教育制度，沒有不是教授治校的。蘇聯早已這樣做了。這個口號不是新的，早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已經提出來了。解放前的清華大學比較辦的安定，有成績，就是因為它的教授會起了很大作用，這是我的個人看法。有人認為這種看法就是否認黨的領導，這是他們的推論。我認為黨能夠領導科學，我們應該爭取黨的領導。“教授治校”就是依靠教授來辦學校，這和依靠醫師來辦醫院沒有兩樣。

（見1957年4月25日文匯報）

重申贖買二十年的主張

(摘要)

(在6月5日中央統戰部召开工商界座談會上的發言)

李 康 年

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鴻兴織造厂董事長，中国鐘表厂總經理，萃众織造厂經理李康年，就是最近报上标题所謂“定息二十年”或者“贖買二十年”的建議者。

我提出了三个建議。

第 一 個 建 議

我主張請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贖買存單二十二億元，收回資本家所擁有的股票或合伙議据，使資本家与企业脫离关系。存單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二千七百五十萬元，除1956、1957两年已发二亿二千萬元外，对資本家只发十九亿八千萬元，多余二亿二千萬元，作为对資方代理人、董監事与需要照顧的資產階級分子，給予一次酬勞或慰藉金，如再有余額，即撥交全国工商联，作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項工作，拟請指令交通銀行辦理，有不願得此項贖買

存單者，得听其自便，交通銀行得代為暫時保存，或按贖買存單應得人之意旨，代為捐獻，或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

贖買存單應得人既已放棄贖買存單，即是放棄剝削之表現，應得人于取得捐獻收據，或繳納國庫之憑証后，即可將此收據或憑証，作為放棄剝削之憑証，而向工會爭取入會，爭取勞保待遇，經工會審查核准，給與工會會員証后，資產階級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議不能採取，則請研究第二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

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辟信託部，代民族資產階級保管股票，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代收股息紅利定息，代辦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捐獻，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按如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帽子。上述建議如再不能採用，則請研究第三個建議。

第三個建議

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加代領定息業務，同時亦得代管股票，及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轉贈捐獻，或繳納國庫。按以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的帽子。

此外如資方家屬的勞動就業，應責成勞動部門及專業公司妥為安排，在贖買存單發行基本上完成后，國內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職務，即蛻變而為公家職位，

公私关系既已基本消灭，此时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贖买存單，其性质与国家公債大同小异，期限且較公債为長，大多数人已經必須自食其力了，与劳动人民距离更近了，阶级基本消灭了，剝削基本消灭了，贖买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业企业改造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資料，已完全成为全民所有了。

自从我的建議書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評。这一次到京以后，讀了千家駒同志的发言，他是中央經濟理論权威，也是我們工商界行政管理領導，他談到了李康年主張定息二十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贖买政策認識錯誤的問題。对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見与他商榷。

我的答复是：我沒有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我今年六十岁了，难道我一定能够活到八十岁么，孩子們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們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計較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断。

“我建議的根據是人民日报的社論”

至于我建議贖买存單年期分二十年，贖买金額应为人民币二十二亿元，定息两字應該更正，我是有根据而不是捏造的。当全行业合营前夕，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統一認識，全面规划，認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社論。这篇文章，我認為是党和国家对贖买政

策的方針，亦是党和国家对工商业者昭示了贖买政策的信條。

第一段“我国在大約三个五年計劃的时期內，基本上完成生产資料私人所有制的变革，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說明大約需要十五年之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段第一节“对于我国工人階級說来，最适当的正是向資產階級的生产資料实行贖买，并且不是一下子贖买，而是在十几年的時間里，逐步贖买。”“分給資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紅利，資本家所得，看来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国統計，一年就有几亿人民币，积十几年之久，就有人民币几十亿之多，用来作为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产資料的代价，是完全足够的了”。这說明国家將以几十亿人民币，来贖买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产資料。

第五段第二节“贖买是对物的，即贖买資產階級的生产資料。除这以外，还有一个对人的問題，即对資本家进行教育改造，适当地安排他們的工作等等問題”。这說明贖买是專对生产資料的，至于对資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这是对人的和平改造。

从此可以見得党和政府，在事先是預有准备，即是需要十五年之期，用几十亿人民币，来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产資料的。党和政府采取这个和平改造的方針，是从1949年立国之初确定了的，这个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观需要，再拖一个尾巴，也是未尝不可的。如果十五年再拖一个尾巴，岂不是二十年嗎？我的建議与党和政府原定計劃步驟相对照，恐怕不是相距太远吧，恐怕不是无的放矢吧？

“贖買应从定息起付之日算起”

我主張無論老合營或全行業合營，一律以定息起付之日為贖買開始之時，財產數字一律以清產核資時所核定的數字為準。

（見1957年6月6日人民日報）

烏 “畫” 啼

徐仲年

1. 烏鳳和鳴

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共产党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凤鳴”与“烏鳴”的問題。“凤鳴”指的是“报喜”，“烏鳴”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黨員：凤鳴要听，烏鳴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烏鴉叫，当烏鳴的时候，就一枪开去：因为一枪开去，烏鴉固然沒法再鳴，可是連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

我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烏鴉变成了“不吉利”的动

物。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用过考证功夫，因此作不出结论。不过可以肯定：①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②古人以为乌鸦是能“报喜”的（可查：“乐府古题要解”中关于“乌夜啼”的解释）。

一般人以为凤凰是很美丽的鸟，其实不然！它是：“麟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说文”），实在没有什么好看！何况还有假凤凰，为数相当的多！

因此对于凤凰和乌鸦的估价，应当辩证地看。能够乌风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

我摹仿“乌夜啼”，作“乌昼啼”。

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

2. 毛毛雨下个不停

和风细雨……

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用不到大张旗鼓，只须和风细雨就够了。

在原则上，这是对的。

然也要看具体情况，不该以不变应万变！

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田初湿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断魂”；不幸而淫雨一年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

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霾之功！某些时候，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不足以息民愤！

尤其不希望对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批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

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髮指！小民主解决小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病该用霸药来治。

3. 敬鬼神而远之

汉语中的“敬”字很少单独用，往往用两个字，例如：“敬爱”和“敬畏”。“敬”，却又“远之”：乃是“敬畏”，决计不是“敬爱”。所谓：“鬼神”，无非是些“牛鬼蛇神”；见了牛鬼蛇神而亲之、爱之、近之者，未之有也！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的师友：人民对于共产党，理应敬之、爱之、近之。事实上确乎如此，人民的拥护毛主席就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

不过……

理应相处无间的“党”与“群”，关系究竟理想不理想呢？恐怕不见得罢！且慢责备人民不肯靠拢共产党，先该检查一下有些共产党党员是否想到靠拢人民？

道貌凛然，心中怀着“民的主”（不是“民主”），眼睛生在天灵盖上（不单单生在额角上而已），一副“你吃我的饭”的神气：有些共产党党员颇象阎罗殿上戴着“一见生财”的帽子的活宝；人民见了，焉得不“敬而远之”呢？

这种共产党的落后分子究属是少数。无奈人数虽少，他们所筑的牆阻塞了党和人民大众的交通！

4. 馬列主義并未獨家經營

十月革命的炮火把馬列主义帶到中国来：当初的馬列主义仅仅是“地下学习”；后来有了老解放区，学习便公开了；大陆全部解放之后，学习变作人的事。

这些史实說明了：①共产党把馬列主义引进中国；②中国人通过共产党而学习馬列主义，也就是向共产党学习。可是，馬列主义学习在大陆解放以后就有些不同了：一方面，共产党仍旧领导政治学习；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可以直接向馬列主义学习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有革命的实践，知識分子有腦劳的习惯：在理論結合实践上，知識分子（我只指非共产党的知識分子）当然赶不上共产党；但在理論上的造就，便很难分誰高誰下了。在此情形之下，知識分子應該向共产党学习怎样理論結合实践；共产党應該向知識分子学习怎样研究分析，俾得提高理論水准。

不幸有些共产党员对于馬列主义頗有“独家經理”之感！甚而有些毛头小伙子的青年团员，在这一点上，当仁不让于老头子。一臉孔的“我来教你”，甚而至于“我来教訓你”，于是把鮮龙活虎、丰富多采的馬列主义变作皂隶面孔式的教条，令人望之生畏！

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經过了种种运动，是惊弓之鳥，是打怕的猴子：对于馬列主义，唯唯否否，不敢贊一詞。他們怕万一講錯了，小簿子記錄下来將來和他算賬！

共产党党员对于馬列主义是否掌握得比較好呢？一般來說，是的！他們因为理論結合了革命实践，体会比較踏实，比較深刻。

共产党党员对于馬列主义是否“人人”掌握得“很好”呢？我說不見得！如果果真这样的话，何必“整”什么“风”？

5. 小論帶坑臭

有那么一种說法：旧知識分子在旧社会里生活得久了，难免有股“帶坑臭”！

話是对的。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据我所知道，共产党员不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煉出来的，确确实实也是从旧社会中来的：那么，在他们的身上，难道就没有一絲一毫的臭气么？

有人說：“他們早就参加了革命，不論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們身上的臭气早已拍掉了：这就叫做‘发展观点’！”

我回答道：“承教了！发展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据我所了解，所謂：‘发展’有‘縱’的发展（時間上的发展）和‘橫’的发展（空間上的发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帶坑臭’这頂帽子只望旧知識分子的头上戴，而且几乎在任何运动中，对于知識分子的‘評定’，都是断章取义，不問发展，不問联系，——要不然只追究‘坏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我发展，你不发展的严重偏差！于是高牆聳立起来了，嗚呼！”

（見6月18日文匯報）

才 與 德

施 蟄 存

衡量人的标准，大致不外乎“才”与“德”。才有通才，有專才，德有盛德，有美德。通才与盛德，可說全面发

展，專才与美德，仅是一节之長。具有通才与盛德，已极不易，才德兼备，更是难得。大抵承平之世，丰于德而啬于才者較多；因为此时生存竞争并不尖锐，人民缺少磨練才能的机会。离乱之世丰于才而啬于德者較多，因为此时生存竞争剧烈，非有才能不易生存，但为了逞才能以求生存，德操便不免会沾些瑕疵了。

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显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傾向，而德的标准又很高，要求的是共产主义的品德，这已是超于我們傳統的盛德以上了。这一方策本来不坏，如果所有领导干部都具有这样高的德行，才虽不足，亦决不致僨事。因为一般的說来，有才无德的人較多，有德无才的人較少。具有共产主义品德的干部，我相信他决不在中才以下。

可惜近来各方面暴露出来的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駭人听闻的。父子之亲，而有協議离弃的文書；师道之尊，而有漁色女学生的风流校長。这些距离共产主义品德，似乎甚远，虽說是个别干部的事情，但在人民大众心里，总是为党惋惜而不是为这些干部惋惜的。

由此看来，任人以德，現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們在最近二十年中，經過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說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則酬以利祿，何必以位？

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須是繼世之君方可。若創業开国之君，則天下离乱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天下，單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

汉武帝刘彻，在元封五年，因为文武臣僚不够用，故下詔求人才。詔曰：“盖有非常之功，必侍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千里馬是不容易馴服的，有才干的人往往是被一般人所指摘的，但汉武帝并不因此而不用此馬此人，因为他自信有能力駕御得了，可以用其所長，制其所短。

魏武帝曹操更为突出。他下过三个命令，要不拘品德，登用人才。甚至說：“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應該由地方官吏保举出来，使他“得而用之”。这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百廢俱兴的时候，“才”的需要尤甚于“德”。尙書說命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亦就是說，要按才能以任命官吏，按品德以評薪評級也。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多，專業分工又細，如果以“德”为任用各級领导干部的标准，即使有超于傳統道德以上的共产主义品德者，如果一点不了解业务，也还恐怕不頂事。何况今天之所謂“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組織性，紀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樊迟請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圃’”。可以想見，盛德如孔子，如果要他去領導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一定自認不如一个老农民的。現在改两句龔定盦的詩，以結束这一点点感想罢：“我愿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用人才。”

（見6月5日文匯報）

告全體同學書

楚 歌

敬愛的全体同學們：

偉大的祖國在前進的道路上是受到了不少挫折的，在滿清几百年的殘酷統治之下，我中華民族所遭受的痛楚，實在是苦不堪言、亦言之不盡的。辛亥革命勝利之後，馬上政權就落到軍閥手中，給祖國帶來了長期的混戰局面，使各帝國主義乘機蚕食鯨吞。偉大的北伐戰爭還未結束，蔣介石篡奪了政權，不惜讓權賣國，不幾年日本強盜又大張侵略，中國使大半國土人民亡為奴隸，八年抗戰剛剛勝利，又暴發了三年內戰，弄得全國人民實在“民不聊生”，共產黨統一中國之後，全國人民皆以為“天下太平”祖國從此可望見光明了，可是又來了“三大主義”危害萬民，有志之士豈不痛心哉！

“三大主義”為何物？明智者心中有知，可是他們產生的根源，有些人可能尚不明確。

“三大主義”是一母所生的難兄難弟，這個母體即是共產黨人的專制集權，因此造成了人民沒有自由，沒有民主，人與人之間不平等，人身的生存沒有保障。……

此外還有一大主義危害更為悽痛。他使中華民族失去獨立性、失去自尊心，遺棄了祖國五千年來的悠久文化傳統，這一大主義即教條主義，在今天為什麼會產生教條主義呢？主要是他民族的文化、奴役的結果。

同學們，有良心的中國人，我們能讓祖國這樣長期下去嗎？不能！決不能！我們是全國人民的寄托者，我們是人民

的大学生，我們要見义勇为当仁不讓，这才算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同學們近日来大家算是吐出了不少怨气，可是我們的目標要看得远一些，眼光要看得深一些，我們不需要提出雞毛蒜皮的小事，我們是向共产党呼吁，我們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要有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我們反对他民族文化的奴役。

同學們起来吧！正义是战不败的，胜利是屬於我們的，期望大家大胆和勇为。

（1957年6月7日下午华东师大历史系系报刊出）

請結束恐怖政策吧！

沉痛者

过去党为了与階級敌人斗争实行了革命恐怖政策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曾忠心地拥护过这是不必多說的。但现在階級敌人消灭了，为什么还不結束这种政策呢？为什么把人民当作敌人不相信人民呢？

記得在旧社会里，我們沒有人身自由，在学校里讀書一举一动，一言一語都被反动派特务紧紧地監視着，因此我們盼望解放。解放后，人身自由了，但我們精神仍然被殘踏着，自尊心受到了破坏，仿佛非党团都是落后分子，我們一言一語都会受到党团象无綫电那样快地傳到組織耳朵中去，并且隨時都可能被扣上帽子，使我們在社会上都被鄙視，各种社会权利（精神和物質）因而也受到影响，低于黨員，反之一些見风轉舵的人能替党充当“密牒”的人都大有作为，

这种現象泛濫于全社会，簡直不能枚舉。但有許多人因為自己有向上爬的思想，所以又不敢公開說，事實上黨團員除了不殺人不打人工作方式不是很多都和國民黨特務一樣嗎？不是動不動就是彙報就說人不是嗎？同志們起來吧！不要為了往上爬。而放棄神聖的人權和自由！起來吧！把許多特務式的黨團員改造過來。

偉大的黨中央和毛主席你們知道這種情況嗎？你們的政策被下面黨組織教條地運用啊！你們支持我們吧！為什麼黨團員處處監視我們呢？難道我們不是年青純潔的人嗎？難道我們不懂得愛國嗎？難道我們不可改造嗎？難道我們不能進步嗎？難道先天注定我們是被監視者嗎？

請除恐怖氣氛吧！讓我們從精神苦海中解放出來吧！尊重我們吧！

（刊在華東師大“爭鳴”黑板報上）

閒話“民主”

胡 放

“現代中國有民主乎？”答案“有”二：一曰“有”，一曰“無”。有也者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一致也，“黨主”實即“民主”也；無也者，黨委（或黨員）決定一切也，民主討論徒形式也。

或曰：“爾乃胡言，何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憲法有明文規定矣！爾

何由出此妄言也”。先生：君言除害，小子何放妄称，但請君勿太天真，君不聞“言論自由要登記”（党委刘副書記語，曾見“浪花”板報），“游行、示威是鬧事”（党委常書記語）之告誡乎？若对党和政府提意見，即被戴以“反革命”之冠，“朕即國家”之鼻祖路易十四之子孙遍及左右焉！黨員可以在任何場合发号施令，系何法規定？集会、結社，則“小集团”之冠來矣！至于体现着基本民权之选举制度若何？曰：凡我选民对其实质当有知也。劝君多視现实，勿死背致条文，否則有犯“教条主义”之危險。

或又曰：“尔之所言，容吾再思想，但現今各級政府（以至各單位）亦有不少非党人士参政，此事又当作何理解？”答案曰对此，余向无研究，不便作答。但有一点建議可供君参考，建議者何？稍留意近来报纸所載有关“鳴”“放”之內容明矣！——“有职无权”之声遍地，非党人士为官者点綴也。

对此种种乃我臣民，耳未聾，眼未花，精神未曾失常者，内心自明也。民主乎？党主乎？自有公論，小人不放妄言。

凡此种种，吾归为宗派主义范疇也，而宗派主义是最終根源——“党天下”是也。（儲安平語見6月2日文汇报）

整风期間，民主空气活跃，史屬空前。但整风以后，情况若何？小子未敢臆断，有待時間証明也。

（华东师大家談第二期6月4日）

中國人的呼聲

不平者

（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苏联的帮助是“偉大的”

“友好的”“長期的”“无私的(?)”……。这点完全肯定的是應該感謝的。可是我們中間有些人簡直已忘記了自己是中国人民！喪失了中国人民那种偉大的民族气概和自尊心！当在报告中、文章上等各方面記載某一項成就时，总是要把“在苏联專家无私帮助之下……”等漂亮句子放在內的（必須指出这專家称呼是有問題的，有些近視眼者只要看到又高大、面孔紅的，綠眼睛的，高鼻子的，会說俄文的，就会异常亲爱地叫“苏联專家”这种称呼是有損專家之威望！簡直是見了胡子就是爷！）某些成就是由于苏联帮助緣故，那是沒話可說的。但是，有些明明是中国專家和工人的創造和发明的，也偏偏要放上这等字句，这簡直是岂有此理！

这种人往往在口头上爱国主义呀！国际主义呀！喊的多响，多漂亮呀！实际上这些人已忘記自己是中国人！他們看不起中国人民！抹杀中国專家的功劳！認為中国人是落后的！这种人可恥！

在国民党时候，什么事和企业都由美国的操縱和顧問，进行奴化教育。强迫念英文…。中国人沒有說話余地。可是今天已解放8年了，中国人應該站起来了，應該由中国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遺憾的很，現在那一个地方沒有苏联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国干部們，更是盛气凌人，把苏联專家捧的七丈高，把中国專家看作飯桶！苏联專家什么都好，沒有錯的地方，即使放一个屁也是香的！中国專家被排挤的透不过气来，沒有发表意見的权利，尤其发表那些与苏联專家相反意見的更是大难临头！一連串“反苏”“反共”“反动”……等大帽子暴雨般的打上来，要你非承認錯誤不行！气憤！这是什么样的制度！在中国境內，中国人沒有說話余地，这

是什么样的社会!

本人并非中国专家，同苏联专家也无难过。但我是个中国人！有民族自尊心，要替中国专家呼吁：学院一律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用不着苏联专家来干涉！（我院例外）高教部是领导全国高等教育的机构，根本用不着苏联专家顾问！精简全国苏联专家！需要者留下，别脚货叫他们回去！这样可积累资金。建设社会主义。

（二）苏联对中国之帮助没有目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铁托元帅的报告最清楚也没有了，露骨地看透了，苏联的什么“外交政策”！苏联对别国之帮助已到达能决定那个国家领袖应由谁来担任的地步！它所代替了别国人民的意志！匈牙利人民无权来选举自己的领袖！这不是侵略吗！

我们极力反对那些污蔑铁托元帅的魔鬼！堂堂的元帅说出这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真相不是假造吧！这当然是事实！不象我们被蒙在被中一点也不知。

最后高呼：必须道歉铁托元帅！拥护南斯拉夫民主政治。（二医学生黑板报）

上海右派集團陰謀暴露

昨天晚上，在上海新聞日報舉行的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陸詒的會議上，陸詒承認了上海的右派分子陳仁炳、彭文應、王造時、楊兆龍、王恆守、夏高陽、孫大雨、許杰、韓鳴和陸詒等是章伯鈞、羅隆基聯盟領導下的一個有綱領、有嚴密組織和分工的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領導的陰謀集團。他們的分工是陳仁炳、彭文應等抓民盟上海市委和文藝戲劇界，王造時、楊兆龍等進攻司法工作，陸詒等抓新聞界，孫大雨、許杰等則在高等學校放火。

羅隆基估計國內可能發生匈牙利事件 指使上海右派利用整風進行陰謀活動

陸詒承認他們和北京章、羅聯盟經常信使來往密謀，在今春一次秘密集會上，羅隆基曾指示他們要利用共產黨整風的機會，進一步作一系列的陰謀活動。羅隆基當時估計，中國國內是“一團糟”，也可能發生匈牙利事件。

陸詒說，早在去年夏季，這個集團已經有計劃地向共產黨的領導進攻，到最近“大放大鳴”期間達到了高潮。他說，去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發生的張孟聞事件，是右派分子明目張膽向黨進攻的開始。就在張孟聞發言的當天晚上，王造時、彭文應、陸詒、孫大雨、趙文璧就在一起密謀。孫大雨並抱怨張孟聞檢查得太早，沉不住氣。果然，后

来孙大雨在政协会議上公开污蔑六十几位党内外人士为反革命分子。而这个发言稿是事先在孙大雨家里經過王造时、彭文应、陆詒、赵文璧、張孟聞等人周密研究过的。他們当时开会直到深夜。后来，市政协开会，准备成立調查組处理孙大雨的污蔑性的发言。会上，这些右派分子又多方为孙大雨辯护，当夜又在孙家密謀对策。孙大雨竟狂妄地說：“就是开几千人的大会，我不怕，打官司，我不怕，就是上国际法庭，我也不怕。”

陆詒承認，他們“檢举反革命”是一个惡毒的手段，就是打击党和党外的积极分子。陆詒說，早在1954年，彭文应即主張在民盟內“肃清反革命”，他开了一張“反革命”名單，其中包括傅于琛、韓学章等。彭文应的目的是警告这些人不得向党靠攏。

今年春天，王造时去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議时，就和罗隆基、章乃器、顧执中、潘大逵等数度密談。罗隆基分析国际形勢說，国际局势未必緩和，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和平解放台湾沒有希望，万一美国进攻，又得逃到內地，再受抗战八年的苦头。罗并認為国内是一团“糟”，罢工罢課鬧得很厉害。因此，这些右派分子就部署了一系列的阴謀活动。这时候，陆詒也正好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宣傳工作会議，曾在前門飯店向王造时献策。他对王造时說，你必須在全国政协会議上发言，否則，真是“虛此一行”了。果然，王造时在发言中販卖了美国式的民主，而发言中“唐太宗多，魏徵少”的阴險的比喻，就是陆詒出的主意。王造时当时对陆詒的这个“妙計”极为贊賞，事后洋洋得意地說，政协会上能与他的发言媲美的只有黃紹竑、章伯鈞和罗隆基，尤以

黃紹竑的发言“最有份量”。黃紹竑在这一次发言中极端地污蔑了肃反运动。

在全聚德飯館密謀組織反動政黨

罗隆基面授機宜章乃器願意出馬

陆詒一到北京，就去拜訪了顧执中。顧执中是陆詒的老师，也是他解放前投奔国民党特务头子陈布雷的引見人。陆詒向顧执中彙报了上海情况，也談到孙大雨，顧曾指示說孙大雨要講策略。顧执中、陆詒和王造时等还想借用恢复救国会的名义来組織一个反动的政党，并曾为此在“全聚德”飯館会商。他們妄想拉攏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侨参加組織，作为他們的反动資本。罗隆基还向王造时面授机宜說，組織是次要問題，共产党就不喜欢我們搞組織，关键在于設法拉攏群众。罗并一再指示他們要小心，章乃器也表示要在这个未来的反动組織中担任职务。

陆詒、王造时回到上海，就与孙大雨等共商大計，孙大雨还嫌救国会名义不好，主張干脆另組政党。陆詒說，这当然是資產階級政党。

陆詒从北京回来后，陈仁炳要他在盟內借傳達中央宣傳會議为名来部署反党活动。陈仁炳早已确定把上海电影制片厂等文艺單位作为放火点，因此要陆詒多談“电影的鑼鼓”一文在北京的反应，以此来煽动电影界对党的領導的不滿。王造时也要陆詒經常彙报上海宣傳會議的准备情况，并特別关心上海高等学校何时开始鳴放，以便放火。陆詒自己也在新聞日报社內部撒下了火种。

上海宣傳會議后右派日夜密商对策 奪取報紙、到处放火、企圖把党整垮

上海宣傳會議開幕后，这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日日夜夜，会內会外，活动頻繁，联系密切。他們几次去孙大雨家中集会。他們在会上发表的种种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謬論都經過集体研究和討論。陆詒在會議期間，还利用职务的便利，曾告訴王造时等有的工厂在鬧事，有的学校罢課，王造时即在宣傳會議上大叫“把鳴放重点放到基层去”。陈仁炳看到宣傳會議上有一边倒的現象，認為，“形势比人还强”，就抛出了“算旧賬”的王牌。陆詒向陈仁炳彙报新聞日报鳴放情况后，陈仁炳說，沈公（沈志远）既为你們撐腰，你們放手干好了。明目張胆地企圖打乱党的整风步驟。

企圖奪取報紙領導使之為右派服务

陆詒說，这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很重視奪取報紙的領導，使報紙為右派的反动陰謀服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們对社会主义的報紙極尽誣蔑。陆詒認為報紙“一片教条主义”。彭文应也說：“報紙新聞太少，把老百姓变成瞎子和聾子了。”他說，美国報紙內容就丰富。他企圖以此来改变人民報紙的方向。陆詒說，陈仁炳对文汇报非常注意，他到上影放火，即与文汇报配合进行。陈仁炳曾告訴陆詒，新聞日报应向文汇报看齐。为了奪取報紙的領導权，文汇报徐鑄成曾向陆詒介紹將党员赶走的“拆牆經驗”，徐說：“我要介紹的拆牆經驗，对你們新聞日报很有启发。”陆詒即回報

社到处宣傳徐鑄成的經驗。王造时更鼓励陆詒要掌握新聞日报，他对陆詒說，你不能屈居于金仲华（新聞日报社長）之下，我們都为此不平，顧执中也很不平。他并要陆詒值夜班，可以决定稿件的取舍。由此，陆詒就在报社內积极攻击金仲华和共产党員，以便自己来“挂帅”。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會議前后，他們專門对反动的錯誤的意見加以鼓励，而对正确的意見加以打击。文汇报記者呂文攻击陈毅市長，陈仁炳說，有勇气。魯莽在市政协会議上作了攻击积极分子的发言，彭文应找陆詒密談：“我已发起支持魯莽的签名运动，日內有人去找你，你一定要发表”。陆詒說，他当时不贊成韓鳴与魯莽联合发言，因为在他看来，要打就应打中要害，魯莽、韓鳴等的发言打击党外积极分子并非要害。

他們經常散布謠言說党不敢放或要收了。陈仁炳更幸灾乐禍地說，共产党的命根子是工农群众，所以最忌說工农生活不好，今天下面形勢已有些不妙，所以收有必要，否則不是要乱了嗎？

彭文应想出三条“妙計”抗拒交代

右派企图訂立攻守同盟終归失败

上海和全国展开轟轟烈烈的反资产階級右派斗争后，彭文应曾与陆詒、王造时等密商对策。彭文应提出抗拒交代的三个办法：不講話；講一点；大辯論。报上揭露了陆詒的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活动后，陈仁炳、王造时要陆詒“坚定”、“沉住气”。陈仁炳还說，共产党作事从来就是一

陣風，一陣風過了，我还是当我的教授，你还是当你的副总編輯。他还无耻地說：“做典型，就做做典型。”与魯莽在政协会上一起污蔑民主人士的罗隆基的亲信韓鳴，还数次登門，要和陆詒訂立攻守同盟。他告訴陆詒說，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你不看上影民盟支部也沒有表示态度嗎？又說，彭文应这几天还是笑嘻嘻的，怕什么？他并要看陆詒檢討的稿子，警告陆詒“要站住，不要倒下去了”。

陆詒交代上述情况后，不少人起立发言，認為他开始交代是好的。希望他痛下决心，作彻底的交代。

（人民日報7月3日）

听听章伯鈞的狂言：

“我說就是要和共產黨爭天下”！

中国农工民主党执行局委員 严信民

几天来章伯鈞在农工民主党内部几次的所謂自我檢查，說明他一直到今天还是何等的不老实。他为了說明大家批評他的反共的一貫性，于是一切从头說起。可是在整整三个半天的发言中，誰也找不到一点儿反共的痕迹。相反，倒是他的革命一貫性。章伯鈞也承認自己是两面派。可是全部发言所表达的只是一面，只是假相的，口是的一面，而不是真相的，心非的一面。为了提醒章伯鈞，我姑且挂一漏万写出以下几点：

章伯鈞算是革命先烈邓演达先生政治遺產的繼承者。那

么邓演达生前究竟是怎样的看待他呢？据伯鈞自己多次說，“邓先生信任季方，不信任我。他的住处从来不讓我知道。”这里應該問：为什么？

章伯鈞常說，“在邓先生周圍，我是社会主义派。”就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章伯鈞抗战期間在重庆在政治上乃至經濟上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可是章伯鈞的心里并不喜爱支持他的人。如不止一次的說，徐冰来一个条子，就得去曾家岩（八路軍办事处、周总理、董老常約他去商量事情），真下作。章伯鈞当时对中共是挾第三方面以自重，觉得共产党对这方面的工作非通过他不可。在与第三方面打交道的时候，显然靠的又是共产党的本錢。他根本上看不起民主政团同盟或稍后民盟的几位领导人，独对張君勱恭維备至。說張的學問道德如何了不起。章伯鈞很贊賞左舜生的識見、才干和为人，而感情深处还是楊虎。伯鈞每自范庄（楊虎住处）归来，总談到楊如何有办法，有势力，徒子徒孙遍天下，在政治尤其軍事上有他的作用等等。言語間則常流露出一尽傾慕、神往的神情。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他們間的关系似乎更深了一层。章伯鈞有一次竟然对我說：“楊嘯天想找一个人写他自己的历史，將罪惡部分都推到蔣介石身上，并已搜集得若干証件，我推荐你，想請你去。写好后，有一大宗收入，对你生活会有帮助。”我順便答复說，茲事体大，請另找高明吧！当时我暗自思忖，莫非章伯鈞想替自己的同乡，四一二滔天罪行的首惡伪造历史，以清白之身混进新中国并在政治上捞一把么？我很怀疑那是楊虎自己的主意。

章伯鈞对人說：

中國社会主义里沒有加上
英美的議會政治是一件大憾事

正是起草宪法，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代表全国人民用尽心机向蔣介石爭民主权利的时候，在一个月色朦朧之夜，漫步回半山新村的途中，章伯鈞向郭則沉和我談心事時說，“今天我們是同志、朋友，大家一样。將來一旦揭开二帘子，登了政治舞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我們听了不禁为之毛骨悚然。君臣之分，即主奴之分。这就是“社会主义”者章伯鈞理想中的“民主”“自由”的王国。章伯鈞認為中国沒有經過資產階級民主，中国的社会主义里沒有加上英美的議會政治，是一件大大的憾事。其实章伯鈞之志，何止于資產階級的民主。他常乐道刘邦、朱元璋执政后的大杀功臣，認為是历史規律。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斯大林后，他說，你看，古今中外，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样。历史肯定的是不会倒退回去的。讓杀气騰騰的章伯鈞干着急吧！

抗战胜利前夕，农工民主党中央商議改換党名（当时一般称之为第三党），章伯鈞一个人坚持用农工民主党名称。大家反对的理由是：共产党是工人階級的政党，同时也真正代表了农民的利益。用农工二字，不仅可能被人誤会为要与共产党爭农工，且与党的真实情况完全不符。章伯鈞的意見会上虽然沒有通过，但他事后到处散布第三党改为农工民主党的空气，漸漸酿成既成事实。到1947年在上海开第四次干部會議时，大家只好承認了。事后章伯鈞对人說，“你們怕与共产党有抵触，我說，就是要和共产党爭天下！”

誇耀蔣介石 鄙視共產黨 希望在“南北朝”中施展抱負

抗战胜利后，章伯鈞僕僕于滬宁道上，每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我們期待好消息的心情，常因他主观愿望的那一套沉重起来。如蔣的实力多么强，装备如何，战斗力如何，將領們又是怎样。最后，还有美国决心支持，美国一定不会讓蔣介石失敗。对馬歇尔，司徒雷登更是贊不絕口。談到共产党、人民解放軍时总觉得有些泄气，这也不行，那也困难，好象富人看不起穷人的样子。起初認为共产党只能活动在黃河流域，后来的結論是：“誰也消灭不了誰，誰也不能战胜誰。”至多是个“南北朝”，是个相持的局面。即長江以北是共产党，江南是蔣介石及其他。在这相持的局面下，第三方面大有可为。在政治上举足輕重。后来民盟被迫解散，章伯鈞悲觀失望，躲在楊虎公館，对見他的一位青年說，想到北方找个寺庙去当和尚。

1948年夏我到香港。那时正是中国人民解放軍在各戰場上获得重大胜利，全国人民为行將到来的全国解放欢騰鼓舞的时候，你想，住在九龙的社会主义者章伯鈞又是怎样呢？他陶醉在联邦制的美夢里，准备自己的力量。在軍事方面他設有專人从事活动。他指示地方組織負責人，凡策反过来的軍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給共产党，章伯鈞分別抽調过几省負責干部面授机宜。当由上海来的曾偉、虞健、赵寿先几位同志劝他不要幻想第三条道路的时候，章伯鈞公然說，毛泽东能領導中国革命，难道我章伯鈞就不能領導嗎？这三位同志回上海不久，就慘遭了敌人的毒手，解放

后几位朋友向章伯鈞談到曾偉等为革命牺牲的时候，他說曾偉死的活該，誰叫他不听我的話。对連瑞琦說，“曾偉是反对我的，他是替共产党跑腿的。”在这里我愿順便說一句：农工民主党的好同志决不止曾偉等三人，是有整批整批的。而这些人都是以靠攏共产党被章伯鈞恨之入骨的。

公開仇視革命仇視共產黨 辱罵左派人士辱罵黨的領袖

很显然，章伯鈞是不欢迎解放中国人民的大軍渡江的。因为解放軍的馬蹄会搗碎他那独立王国的美夢。他想的只是乘中国人民革命的熊熊火焰，劫夺南方几个省份，权且作个小朝廷，再策划未来。章伯鈞的政治野心，个人利益，使他情不可遏地，甚至公开地仇視革命，仇視共产党。如果說章伯鈞的反共有其一貫性，應該說，他在香港的那一段时期，其瘋狂、无耻，已經达到了最高峰。当时章伯鈞罵尽所有的左派，說郭沫若、邓初民等是共产党的应声虫，沒有骨气。尤其鄙視的是盟内共产党人周新民等。在这里我想到胡风的“我几乎恨一切人”。但章伯鈞恨的也不是所有的人，他同右派的感情很好，他向我說周鯨文这个人很不錯。我在一个下午去看周鯨文，周也对我流露出对章伯鈞的仰慕之忱。

章伯鈞对中共当时在香港的几位負責人的看法是，过去某某等領導工作，无能，不識大体，不懂政策，結果搞乱，搞坏了工作，大失人心，才是潘汉年到后情况有所改变，認為潘能干，有办法。但这还只是表面的一套，事实上章伯鈞对中共是恨入骨髓的。

我因为由解放区来，章伯鈞怀疑我入了共产党。最近，

（三个礼拜前）他还向李伯球說，严信民当时是共产党派来監視我的。所以他見了我，有时感情难以控制起来。

有一天上午，我專誠到九龙章伯鈞寓所去談話，有李健生在場。我介紹了解放区情况，談到各种政策，最后談到統一战綫，談到周总理对他的期望。我看到章伯鈞的臉色蒼白，他猛然站起身来，顫抖抖地喊叫“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我說还是鎮靜一点，理智一点。一場談話就是这样地不欢而散了。

这就是章伯鈞对六亿中国人民热爱的領袖，对领导中国人民由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主席的报答。

罗隆基說，把他的骨头燒成灰，也找不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企图和阴謀。我借这句话說，把章伯鈞的骨头燒成灰，找到的也只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企图和阴謀。

可是大家都听到章伯鈞口口声声說：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好，到北京后的事情再說吧！

（人民日报7月3日）

儲安平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是右派

李 兵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儲安平先生发表了所謂“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的謬論，向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提出挑战，这絕不是偶然的。这有他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同时这件事也向我们表明了，在儲安平先生的思想深处仍然牢固地保存着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資本主义的“民

主自由主义”仍然在一些知識分子心目中陰魂不散。

三十岁左右的知識分子，大都知道儲安平是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主編標榜为“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观察杂志而知名于世的。虽然观察杂志明文規定文責自負，它所刊載的論文編者并不一定同意，但是整个的說，这些論文的傾向（特别是儲安平自己的論文），實質上是代表当时所謂“自由主义的道路”，所謂“中間路綫”的。1947年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中指出：“蔣介石統治区域的上层小資产階級及中等資产階級，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階級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傾向，他們替美国帝国主义与蔣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們反对人民民主革命。”而当时的“自由主义的道路”“第三条道路”“中間路綫”就是这种反动政治傾向在思想战綫上的反映。

我不愿低估观察杂志在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腐朽透頂暗无天日的統治这一方面的作用。但是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他們也散布了許多恶劣的反动的影响，阻碍了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許多知識分子在他們的影响下躊躇徘徊，不能早日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当时的儲安平先生和观察杂志在国际关系上采取了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立場，敌友不分，經常將苏联与人民所深惡痛絕的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論，甚至散布反苏濫調。例如儲安平曾經公开地支持楊光时等十人提出的組織“民主国际”用以对抗国际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建議。当时儲安平曾同吳世昌一起研究了楊光时等人的見解。吳世昌在“論民主国际”一文中写道：“本刊的編者儲安平先生使我在此文

(指楊光时等十人的文章)未发表前有讀到的机会。我們都認為这一篇文章中所提的若干見解，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都是从未經人說过，且极有建設性的价值……大体上可以令人同意。”（見觀察 2 卷22期吳世昌：論民主国际）

在國內，中国人民与反革命正处在生死决斗时期，在漫天的革命大风暴中，儲安平先生尽力散播改良主义的毒素，标榜出所謂革命以外的自由主义的道路。本来，改良主义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沒有广泛的階級基础。三大敌人在政治上是穷凶极惡的統治，不給人民以任何民主权利；經濟上是敲骨吸髓的剝削，不仅使工人階級农民階級活不下去，甚至民族資產階級都处在复巢之下，岌岌可危。因此中国人民除了在共产党領導之下进行革命以外，別无出路。但是儲安平先生却在反动派已日暮途穷，革命已經胜利在望之际，通过观察和自己的一些著作（如英国采风录）在理論上大肆宣傳資本主义民主的优越和英国工党的德政。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虛伪与欺騙变成了誠实和公正，把建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血汗上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貴族的統治描繪成一幅綺丽动人的图画，說成是中国人民应当遵循的最理想的道路。

虽然儲安平先生也經常激昂慷慨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統治，但是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在思想感情上对反动政权必然是情意綿綿藕断絲連的。因此往往在抨击了国民党之后又显露出策士的面孔，为国民党借著一籌。例如1947年“五·二〇”学生运动中，儲安平先生在“大局浮动、学潮如火”一文中最后就說什么“要执政当局拿出良心和办法来，一一見之实行。今日中国最迫切需要者，实莫过于执政当局能够

牺牲他們已得的一部分权利，唯有这样，人心才能平，社会才得安定！”

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思想本质上必然是同共产主义和人民革命相抵触的。因此儲安平先生当时对于中国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象对国民党一样表示了同样的甚至更大的厌恶。他說：“老实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国民党統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問題，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問題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統治精神上說，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組織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張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儲安平：中国的政局，1947年观察二卷二期）如果把這些誣蔑言論与今天儲安平先生所謂“党天下”論調，反对无产阶级專政的論調相比，虽然隔了十年，我們不难发现蛛絲馬迹，前后是一脉相承的。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和旧社会已經在分崩离析的前夕，連儲安平先生也看出“民心的涣散，經濟的崩潰，軍事上的沒有把握。南京显已淪入暗淡与苦痛之中。”“据我們观察現政权已失挽回这个頹局的力量，最近且已失去挽回这个頹勢的自信心。”但是儲安平竟敢狂妄地要爭取民主革命运动的領導权，阻撓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他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提出：“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則今天能动搖国民党政

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当时还分析了所谓“国共两党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认为自由思想分子的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他认为民盟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组织。他认为民盟的领导人物中沈钧儒、黄炎培等人都是过去的人物，只有罗隆基一人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章都来，有煽动力，有原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因而，虽则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但是“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载观察二卷二期）如果把这些言论和今日储安平及其他一些右派分子的“要共产党下台”“民主党派轮流执政”等向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谬论加以印证，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右派分子的本质，右派分子的真正面目。但是很遗憾，螳臂毕竟不能挡车，不仅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就连储安平先生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分子”“中间路线”都没有扭转历史的车轮！1949年三大敌人在中国的统治完全复灭了。而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观察杂志，储安平先生才无可奈何地被“逼上梁山”——参加了革命。

尽管储安平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散布了这么多的反动言

論，但是解放后党和人民仍然历史唯物地对待这些問題，并没有对他有所苛責。并且在工作上地位上予以适当安排。选他作全国人民代表，使他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編輯这个重要职务。作为一个观察的讀者，我也曾以极其欣慰的心情，看到了儲安平先生在1949年11月解放后出版的观察杂志上进行了自我批評，能初步認識自己的錯誤。后来又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儲安平留居新疆，写出了些歌頌英雄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建立的丰功偉績的报道。我多么衷心地希望他能够彻底地改造自己与人民共同前进。但是曾几何时，儲安平先生竟露出了尾巴，又对共产党进行誹謗誣蔑，又狂妄地要夺取工人階級的領導权了。但是时代变了，在强大的无产阶级專政和巩固的工农与知識分子联盟面前，儲安平先生企图販賣資產階級私貨的企图被查获了，“民主自由主义”現在已經沒有广泛的市場。但是这件事情也向我們說明了一个真理，“对于許多受过資產階級教育、从各方面感染到資產階級思想影响的知識分子，接受社会主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知識分子的改造也同样需要脱胎換骨。不彻底地改造自己，“早晚会被拋出时代的列車”！至此我不禁一再咀嚼伏契克的名言“人們，我爱你們，你們要警惕呵”。

（人民日报7月3日）

補 遺

譚惕吾的反動謬論

(摘要)

(在6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她說：共產黨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政府部門却沒有權。黨直接指揮黨員，會把國家搞亂。她認為不應在政權之外再搞一套黨的系統。

譚惕吾提出了四個問題。第一個是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方式問題。她說，黨領導國家，大家承認，但用什麼方式值得研究。現在政府有一套機構，黨內又有一套機構，這是“雙軌制度”。她說，黨內一套是清一色，不與群眾在一起，脫離實際，這怎會不產生三大主義和“牆”“溝”。原說黨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實際上已超越這個範圍，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政府部門卻沒有權。她認為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指示，是由於國務院單獨發指示不起作用。她說，既然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為什麼自己專政的機構不用，而要削弱其職權，另在政權之外來搞一套黨的系統呢？她希望中共中央考慮這樣做是否合乎中國國情。

接着她就黨領導國家的方式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主席辦公室應該擴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機構要充實，要發揮它的作用，共產黨員到這個權力機關來監督政

府，掌握政策；把共產黨內各個部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里的各種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內可以設黨組，吸收非黨人士參加工作。

她談的第二個問題是：黨的政策應該如何體現。她說，黨直接指揮黨員，會把國家搞亂了。她認為黨應該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會製成法律，再由國家管理機關根據法律製成各種法令，通過法律、法令的實施，體現黨的政策。她認為不應在法律、法令之外，再發內部指示。她強調說，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

她還說：共產黨是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呢？還是自己搗自己的亂呢？又說，共產黨可以派黨員到司法、檢察等機關去擔任負責工作，但這些部門不應該受黨委領導。

第三個是黨遵守憲法和國家制度問題。她說，黨制定政策，應在憲法範圍之內。在這裡，她再一次提出了上海對房產商的改造問題是違反憲法的。譚惕吾要求中共中央檢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憲法有抵觸的？如有，要趕快糾正。她說，過去不遵守法律是為着推翻政權才不遵守它。共產黨今天是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呢？還是自己搗自己的亂？她認為這不是小事情，共產黨必須遵守憲法。

關於國家制度問題，譚惕吾說，司法、律師、檢察是對執行國家制度起杠桿作用的，但在有些地方這三者是在一個黨委領導之下，她認為這是不好的。會場當時有人問她：司法、律師、檢察在一個黨委領導之下，是受一個黨員領導，還是受黨委會的領導。她回答說她不知道。譚惕吾認

为，共产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檢察等机关去担任負責工作，但这些部門不應該受党委領導。

第四個問題，是怎样使共产党接受全国人民的監督。她說，政府受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但是党不受什么監督。她認為應該建立制度使人民監督共产党。

（原載人民日報）

楊玉清的反動謬論

（摘要）

他說：一切發源于北京，亂搞就从北京亂搞起。

在北京的上級干部要下轎，有的还要下台。

“政法研究”副總編輯楊玉清把这次整風运动叫作“下轎”运动。他說，有些共产党员坐轎子，脱离群众。八年来培养的是什么人呢？他認為培养的是抬轎子的人。他說，至今还有人不愿下轎子，那些抬轎的人也还不愿放轎杆。

楊玉清說，有人說“上級干部太好，中級干部太少，下級干部乱搞”。他反对这种說法，他強調說：“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

他說，首先在北京的上級干部要下轎，他認為不但要下轎，有的还要下台。

楊玉清又說，過去做司法工作的人，有的該殺，有的該關，但是他認為有的不該殺，有的不該關。他還說，有的殺了，有的關了，而另一些學舊法的人卻做了部長、司長。他說，這些人應該下台，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憤。還有一種人特別應該下台，人民日報總編輯非下台不可，因為人民日報幾年來都在歌功頌德，這次運動想“收”不想“放”。

楊玉清接着說，文人的筆杆天然是反現狀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現狀的，從古以來好文章都是反現狀的。楊玉清鼓吹反對現狀，鼓吹要做所謂“仁人志士”。他說，歌功頌德的人是不為人所稱道的。楊玉清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僅要廣開言路，還要“廣開賢路”。他說，許多人不是光講話的，他也能干事，今天的事應該誰有本事誰來干。但有些能干事的人，往往被以某種條件不夠為借口，被一脚踢開。今天就要打破這個關。

（原載人民日報）

供内部学习用

定价：0.20 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提高警惕粉碎右派阴谋

作者=页数126

页数=126

SS号=13769783

DX号=

出版日期=1957.07

出版社=